

北伐後期以降的中英互動與海盜問題交涉 (1928-1929)*

應俊豪 **

本文主要擬反思隨著國民革命北伐軍事行動進到尾聲，當中英關係也因北伐影響而逐步改善的大環境下，雙方合作處理廣東海盜問題的實際情況。尤其將關注在這一段期間主掌廣州政局的李濟深與英國之間的關係。由於廣東毗鄰香港，雙方商貿連動、關係密切，故英國一直希望能夠扶植出一個對英親善的廣州當局。自國民革命軍北伐軍事行動開展，隨著國民黨軍政領袖陸續北上，留守廣東的李濟深則成為英國關注的對象，積極疏通與李濟深之間的關係。李濟深本人也對英國抱持著較為友善的態度。因此，在北伐期間，雖然整體中英關係仍陷入低盪之際，英國與李濟深之間已經慢慢開展互動關係。對於英國亟欲解決的廣東海盜問題，李濟深也開始釋出善意，採取實際軍事行動來打擊海盜勢力。其次，對海盜肆虐深惡痛絕的不只英國，廣東本地商民長期以來即備受海盜勢力的欺凌與劫掠。而海盜活動的猖獗，非但對百姓身家性命以及商貿活動構成危害，也會間接影響到地方稅

* 本文為筆者科技部計畫「愛仁輪劫案與中英海盜究責問題之爭(1927-29)」(MOST 103-2410-H-019-002-)部份延伸研究成果。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的細心審閱，並提供極具啟發性的修改建議，在此特致謝忱。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聯絡地址：20224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NO. 2, Beining Rd., Zhongzheng Dist., Keelung City 20224, Taiwan [R.O.C.])。

收。故李濟深無論是出於對自己地盤收入的確保，或是保境安民的需求，還是為北伐前線提供穩定大後方等諸多考量，均必須正視海盜活動的危害。再者，整體中英關係，也隨著北伐的進程，而有著極大的變化。特別是隨著日本在山東介入北伐軍事行動，為了提高與日本外交周旋的力量，國民政府必須拉攏英國，故在對英外交上必須改變以往的敵對態度。即是之故，在1928-29年間，國民政府與廣州當局均開始對英國展現更大的善意，並以實際行動來試圖解決華南水域的海盜問題。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英國不但調整以往軍火禁運中國的政策，兩度協助廣州當局生產適合的反盜汽艇，並提供所需的各類軍火，同時也對於中國方面的剿盜成效，開始抱持正面的評價。

關鍵字：廣東海盜、中英關係、北伐、李濟深

一、前言

假如不立即訴諸於最激烈與最廣泛的措施，廣東海盜的情況勢將無法有效的解決。除非中、英雙方願意竭盡所能地承擔責任，否則防盜的成效可能還是相當負面的。

——粵海關稅務司賀智蘭

(R.F.C. Hedgeland, Commissioner of Customs, Canton)

1927年11月¹

海盜問題是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的老問題。每當中央政府勢力減弱，逐漸失去對地方的控制，或是社會失序，陷入嚴重動亂時，各地的盜匪問題幾乎就會浮出檯面，形成內陸地區土匪為患，而沿海地區海盜肆虐的普遍現象。近代以來，自太平天國之亂起，中國東南半壁陷入連續十數年的長期戰禍，百姓流離失所，盜匪現象自然也隨之而起，成而為政府當局必須處理的棘手難題。而對在華擁有重要商貿利益的英國來說，內陸的土匪問題雖然嚴重，但尚不會構成英國在華利益的嚴重威脅，因當時英國在華商貿網絡主要乃是依靠水路運輸，只要能夠維持航路暢通，即能確保通商口岸間的往來運輸無礙。但是海盜問題，則會直接構成航運安全的重大危害。²從1850年代前期的中英換約爭議，到後期的英法聯軍之役，如何有效解決海盜問題、確保航運的順暢，即是英國反覆籌思並向中國提出的重要外交訴求之一。在《中英天津條約》中，即將中國政府必須與英國會商共同解決海盜問題的規定，明確載之於條約。³在條約規定的影響下，中國中

¹ “Memorandum on the Searching of Chinese Passengers for Arms,” by R.F.C. Hedgeland, Commissioner of Customs, Canton, 17 November 1927, CO129/507/3.

² 太平天國之亂期間，海盜問題對於英國的影響，可以參見 Shelia Hamilton, *Watching Over Hong Kong: Private Policing 1841-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93-94.

³ 根據《中英天津條約》第53款規定，「中華海面每有賊盜搶劫，大清、大英視為向於內外商民大有損礙，意合會議設法消除。」見《中英天津條約》(1858年)，收錄在黃月波等編，《中外條約彙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6。

央與地方政府開始與英國合作，積極致力於打擊盤據東南水域的海盜勢力。⁴其次，隨著太平天國之亂的平定，地方秩序逐漸恢復穩定，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道也趨向強化，不利於海盜的成長與活動。尤有要者，19世紀後半期，西方新式大型蒸汽輪船也開始引進至東亞水域，輪船有著噸位大與航速快的顯著優勢，使得中國傳統以木帆船為劫掠工具的海盜勢力，再也無法輕易得手。也因此，海盜問題逐漸獲得控制，英國也終於擺脫商船經常遭到海盜劫掠的威脅。⁵

然而，好景不常，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下台，但新成立的民國政府，卻深深陷入南北對立與軍事派系鬥爭的泥沼中，各地軍閥內戰不斷，社會失序情況嚴重，特別是沿江沿海地區又成海盜團體活躍與蓄積實力的最佳場所。⁶由於英國在華勢力範圍以長江、珠江流域以及香港為主，故對於華南水域與長江流域的海盜勢力最為顧忌。而在這些海盜勢力中，對英國在華商貿利益威脅較大、犯罪活動頻繁的，莫過於廣東海盜問題。尤其廣東惠州南方大亞灣地區的海盜勢力，更是成為1910、1920年代英國眼中最為兇狠剽悍的犯罪集團。⁷廣東大亞灣海盜與晚清華南海盜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放棄了傳統以木帆船作為劫掠工作的手段，並針對輪船運輸安全的漏點，開發出新型態的犯罪模式：化整為零，並偽裝乘客購票登船，但暗中挾帶手槍武器，待輪船行駛至公海水域，再利用夜色的掩護，重新化零為整，襲擊船上船員，控制整艘輪船。廣東大亞灣海盜的主要活動範圍，也不再僅侷限在中國洋面，而是北起上海、南至新加坡的廣大東亞水域。⁸而

⁴ 村上衛，《海の近代中國——福建人の活動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3），頁136-181。

⁵ Times of Ceylon, 3 September 1927, cited from “Bias Bay: Ceylon Papers Comment on Raid,” *The China Mail*, 21 September 1927.

⁶ “Situation in China,” Minutes of Foreign Office, April 1924. FO371/10243.

⁷ 尤以1920年代後劫案數量更是登上高峰。可以參見香港警察部門的調查報告，見L. H. V. Booth, Assistant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 Hong Kong, “Precis of Piracies Committed by Bias Bay Pirates since 1921,” CAB/24/181:0072、FO371/11671.

⁸ 關於民國以來廣東海盜的運作模式，可以參見英國方面的詳細報告，見“A Draft Note from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to the Ministers for Foreign Affairs, Na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June 1929, CO129/515/1；“Anti-Piracy Measures,” by Rear

這片水域正是英國在東亞航運最重要的航道所在，尤其是新加坡、香港與上海三港埠間輪船運輸的順暢與否，關係到英國商貿利益甚鉅。也因此，英國亟欲謀求廣東海盜問題的解決。

但是民國以來，受到南北對立的影響，北京政府空有中央之名，卻無力約束廣東等南方地區，英國雖欲直接與廣州當局交涉以推動中英合作剿盜行動，但卻持續遭到廣州當局的擱置或拒絕。⁹一直要1924年左右，英國才獲得孫文的同意，開始與粵軍合作，合力進剿廣東海盜。¹⁰但是雙方的合作僅一年多，隨著孫文北上病逝，再加上1925年爆發五卅事件與沙基慘案，廣州當局正式與英國決裂，推動反英風潮與省港大罷工，對英實施經濟絕交，合作剿盜行動自然也就無以為繼了。1926年，廣東方面開始進行國民革命軍北伐，雖然與英國關係有所改善，也終止了與英國的經濟絕交行動，但雙方關係依然稱不上親善。自孫文推動聯俄容共政策以來，俄國顧問團與中共勢力在廣東內部活動日漸活躍，也是在俄國提供的軍事援助下，北伐軍事行動才得以順利開展。然而，英國自始即對俄國與中共勢力進入廣東感到憂心不已，擔心其所推動的赤化行動與反帝宣傳，會對英國在華利益構成威脅。特別是隨著北伐軍事行動所開展的革命外交，更令英國感到戒慎恐懼，懷疑廣東方面意圖挑戰晚清以來樹立的條約特權體制，並以暴力手段收回列強在華的租界。

不過，隨著國民革命軍勢力進到長江流域，再歷經南京事件，以及日本開始介入北伐行動之後，中英關係也隨之產生劇烈變化。對於國民政府來說，如何抗衡日本才是首要之務，至於早先的反英運動反倒更顯無關輕重，國民政府必須積極努力爭取英國的支持。也因此，本來陷入僵局的海

Admiral, Hong Kong, June 1930, CO129/521/3.

⁹ 例如龍濟光、陳炯明等主政廣東時，均曾擱置或婉拒英國合作剿盜的請求，見“Letter from Civil Administrator, Kwangtung, to H. M. Consul-General, Canton,” 8 May 1914, SP 1927, No.7, p. 150; “Letter from Commander-in-Chief, Kwangtung, to H. M. Consul-General, Canton,” 9 January 1923, SP 1927, No.7, 152-153.

¹⁰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24/202: 0024.

盜問題交涉，遂脫胎換骨，正面處理廣東海盜問題也就成為國民政府向英示好的絕佳手段之一。而英國同樣也樂觀其成，利用此良機，加速促成雙方的軍事合作關係，藉此謀求廣東海盜問題的徹底解決。

本文主要擬反思隨著國民革命北伐軍事行動進到尾聲，當中英關係也因北伐影響而逐步改善的大環境下，雙方合作處理廣東海盜問題的實際情況。尤其將關注在這一段期間主掌廣州政局的李濟深與英國之間的關係。¹¹由於廣東毗鄰香港，雙方商貿連動、關係密切，故英國一直希望能夠扶植出一個對英親善的廣州當局。英國先前對陳炯明的支持，也是基於相同的考量，可惜陳炯明最終無力對抗孫文而失敗下台。自國民革命軍北伐軍事行動開展，隨著國民黨軍政領袖陸續北上，留守廣東的李濟深則成為英國關注的對象，積極疏通與李濟深之間的關係。李濟深本人也對英國抱持著較為友善的態度。因此，在北伐期間，雖然整體中英關係仍陷入低潮之際，英國與李濟深之間已經慢慢開展互動關係。對於英國亟欲解決的廣東海盜問題，李濟深也開始釋出善意，採取實際軍事行動來打擊海盜勢力。其次，對海盜肆虐深惡痛絕的不只英國，廣東本地商民長期以來即備受海盜勢力的欺凌與劫掠。而海盜活動的猖獗，非但對百姓身家性命以及商貿活動構成危害，也會間接影響到地方稅收。故李濟深無論是出於對自己地盤收入的確保，或是基於保境安民的需求，還是為北伐前線提供穩定大後方等諸多考量，均必須正視海盜活動的危害。再者，整體中英關係，也隨著北伐的進程，而有著極大的變化。一來隨著清黨行動的出現，國民政府內部的中共與俄國勢力遭到排除，這也意謂著在對外關係上應會有所改變，而原先的革命外交與反帝訴求等路線也將有所調整。二來隨著日本在山東介入北伐軍事行動，為了提高與日本外交周旋的力量，國民政府必須拉攏英國，故在對英外交上必須改變以往的敵對態度。即是之故，在1928-29年間，國

¹¹ 本文主要從中英關係與地方外交的角度，關注在李濟深主政廣東期間，作為地方實力派，他與英國之間針對海盜問題的交涉與互動經過。至於李濟深本人在當時國內政治派系中的地位，及其與其他軍政要員之間的關係，本文不擬深入處理，以免轉移焦點。關於李濟深的軍政人際網絡關係，可以參看徐敏蕙，〈李濟深入際網絡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3）。

民政府與廣州當局均開始對英國展現更大的善意，並以實際行動來試圖解決橫行華南水域的廣東海盜問題。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英國不但調整以往軍火禁運中國的政策，兩度協助廣州當局生產適合的反盜艦艇，並提供所需的各類軍火，同時也對於中國方面的剿盜成效，開始抱持正面的評價。

關於1920年代中英合作剿盜問題，筆者先前已有部份研究，特別是在北伐軍事行動開展前，由孫中山、陳友仁、李福林等人主導下，中英雙方曾經共同合作，採取軍事行動來處理廣東海盜問題。¹²然而之後受到五卅事件後的反英風潮以及抵制運動的影響，中英關係陷入極度緊張狀態，合作剿盜行動乃無以為繼。雖然英國曾多次提出抗議交涉，願意提供軍事協助，企盼能夠重起合作剿盜計畫，但始終未能如願。¹³北伐後期，隨著日本出兵山東、介入北伐，中外情勢又有很大的變化，國民政府為了抗衡日本，著手調整對英外交政策，中英關係也趨於和緩，所以中英雙方合作剿盜計畫，自然又出現新的契機。本文利用中外原始檔案，以及當時的報紙報導，深入探究北伐後期以降，隨著中英緊張關係漸趨和緩後，雙方如何針對剿盜與防盜議題進行合作。中國方面的檔案資料，主要利用《蔣中正總統文物》，可以藉此略窺在北伐後期蔣中正對於英國的態度，以及蔣中正與廣州領導人物李濟深有關對英外交與中英合作的意見討論。¹⁴至於英國方面，則以殖民部微捲檔案(*Colonial Offic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Hong Kong, CO129*)為主，其中有許多香港總督府介入處理中英海盜問題之爭以及規劃雙方合作範圍與性質的分析報告，以及英國駐華公使館、駐粵總領事館與香港總督

¹² 在1924-1925年間中英軍事合作剿盜情況，參見應俊豪，〈1924-1925年英國政府處理廣東海盜問題的策略運用：中英軍事合作剿盜行動〉，《國史館館刊》，第37期(臺北，2013.09)，頁1-48。關於北伐以前英國為推動中英合作處理廣東海盜問題的正規與非正規作法，可參見筆者前年出版的專書。應俊豪，《英國與廣東海盜的較量——一九二〇年代英國政府的海盜剿防對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5)，頁319-400。

¹³ 五卅事件後以至北伐前期，中英海盜問題交涉及其中曲折，可以參見應俊豪，〈五卅事件後中英合作防制廣東海盜問題交涉〉，「國際合作在中國外交史學術研討會」，臺北：政大人文中心，2016年1月29日。

¹⁴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

府內部磋商防盜合作細節的往來電文。¹⁵此外，北伐時期的廣東海盜問題以及中英合作情況，牽涉到中英和解情況以及英國調整對華政策的轉向，在當時亦為其他列強所關注，所以本文也參考日本外務省的《支那海賊關係雜件》，¹⁶以及美國國務院的「中國國內事務檔案」(*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 RIAC*)，以便從外部旁觀者的角度，評析他們如何看待中英合作處理海盜問題的情況。¹⁷報紙部份，廣州當局的機關報《廣州民國日報》是最重要的參考資料，足以體現當時廣州當局在對英外交與剿盜問題的態度，特別是每當廣州當局採取軍事剿盜行動後，該報即會以顯著篇幅報導，背後顯然帶有對英宣傳與展現合作誠意的意味在內。英商在華的重要報紙，例如《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字林西報》(*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等也是重要報導。此外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英文《中國年鑑》(*The China Year Book*)、英文《華北正報》(*The North China Standard*)、《世界日報》等報章媒體，也有部份報導關係到中英海盜問題交涉，故也將一併參考。

二、北伐期間中英合作處理海盜問題的初步互動

北伐時代的中英關係一直是外交史學界關注的重點，特別是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軍事行動順利進展至長江流域，影響到英商在華的龐大商貿利益，英國也不得不慎重思考，是否該重新檢視對華政策，不再以地方政府或割據勢力來看待國民政府。¹⁸然而，此時中英關係卻持續陷入低潮。自五

¹⁵ 香港公共圖書館藏，英文微捲檔案。

¹⁶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檔案。

¹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英文微捲檔案。

¹⁸ 例如Edmund S. K Fung,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 1924-1931*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呂芳上，〈北伐時期英國增兵上海與對華外交的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7期(臺北，1997.06)，頁187-229；Chi-hua. Tang, *Britain and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26-1928*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PhD Dissertation, 1991)

卅慘案、沙基慘案與省港大罷工以來，國民政府在蘇聯顧問團的協助下致力於推動反帝、反英宣傳與經濟抵制運動，雙方之間幾乎呈現敵對、斷絕往來關係的狀態。北伐軍事行動展開後，雖然抵制行動已漸趨緩，但敵視英國的策略仍然延續，「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口號響徹雲霄，英國則是國民政府要打倒的列強首惡之一。尤令國民政府憤怒的是，在英國駐華公使館的暗中授意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竟然拘捕在租界內活動的國民黨人，並將其移交給北京政府處理，這使得國民政府忿忿不平聲稱要將英國之罪惡訴諸於世界各國。¹⁹再者，國民政府在北伐期間推動的革命外交，動員群眾以強制手段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一度也使得國民政府與英國間瀕臨決裂的邊緣。²⁰而南京事件的發生，從華兵殺害外人，到英、美列強的報復作為，甚至不惜動用砲艦外交，轟擊南京城區造成多人死傷，即體現著英、美對於國民政府北伐行動過程中排外反帝行為的反彈。²¹中英之間的緊張情勢，一直要到北伐中後期，才逐漸舒緩。其實，當北伐軍事進展到長江流域時，國民政府內部即有與英國和解、拉近關係的聲音。南京事件發生後，此一傾向又更為強烈，蔣介石等人即主張爭取英、美的支持。²²之後，北伐行動再起，國民革命軍準備進軍華北時，因日軍在山東介入北伐行動，不但阻礙進軍且造成濟南事變，故國民政府積極拉攏英國，更加釋出善意，以圖抗衡日本。而英國也認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業已清黨，並與蘇俄、中共劃清界限，不再刻意操作反帝、反英宣傳，並向英、美表達親善之意，故也順勢調整對華政策，強化與國民政府的關係。

與此同時，廣東海盜犯罪集團也未曾稍偃旗鼓，反而利用北伐軍事行

¹⁹ 關於天津英租界國民黨人引渡案涉及到的中英角力與影響，可以參見筆者另外一篇研究，見應俊豪，〈英國與中國南北兩政府——北伐初期天津英租界國民黨人引渡案研究(1926)〉，《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12期(臺北，2007.09)，頁61-84。

²⁰ 關於北伐期間革命外交的運作模式，可以參見李恩涵，〈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一書。

²¹ 關於南京事件始末及英美等列強的砲艦外交模式，可以參見牛大勇，〈對1927年南京事件的再探討〉，《江海學刊》，第6期(南京，1989.06)，頁145-150；吳翎君，〈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為中心的探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頁217-234。

²² 韋慕庭，〈國民革命：從廣州到南京(1923-1928)〉，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594-811。

動，廣東境內軍隊多數北調、駐軍不足的地方權力空窗期間，大肆活躍於華南海域上，劫掠往來的中外船隻。在華航運利益居各國之冠的英國商船業則首當其衝，經常淪為廣東海盜蹂躪的對象。英國與香港政府無法容忍廣東海盜對英國航運的威脅，屢次向國民政府提出嚴重交涉，要求儘速展開軍事進剿行動，徹底根除海盜據點，或是與英國海軍攜手，共同打擊海盜勢力。但是在前述緊繃的關係下，加上國民政府忙於北伐軍事行動與內部權力鬥爭，自然無暇也不願意積極處理。中英雙方針對海盜問題責任歸屬的交涉，同樣也陷於交互指責、不歡而散的情況。例如 1926 年 10 月的新寧輪劫案(SS *Sunning Piracy*)、²³1927 年 1 月的雙美輪劫案(SS *Seang Bee Piracy*)、²⁴10 月的愛仁輪劫案(SS *Irene Piracy*)等引發的後續爭議，²⁵均是顯著例子。²⁶也因此，香港總督府迫不得已，早已向殖民地部正式提案，希望英國政府授予香港總督府直接動武之權，亦即如果國民政府以及廣州當局依然漠視廣東海盜問題對於英商航運的危害，又不願意接受英國方面的軍事協助，則只要再發生英船劫案，香港總督應有權逕自調動駐港海、陸軍，採取獨立軍事行動，直接派兵進剿廣東的海盜聚落。即是之故，香港總督府與英國駐香港以及廣州的海、陸軍部隊，在 1927 年先後三次針對大亞灣以

²³ 新寧輪隸屬於英商太古輪船公司，1926年10月從上海出發前往香港途中，遭到偽裝乘客的海盜襲擊，被劫往廣東大亞灣水域。參見“Telegram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23 November 1926, FO371/11671.

²⁴ 雙美輪為懸掛英旗的英國輪船(但船主為華人)，在1927年1月從新加坡出發前往香港途中，遭到偽裝乘客的廣東海盜襲擊，被劫往大亞灣水域。參見“The *Seang Bee Piracy*,”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2 February 1927.

²⁵ 愛仁輪為輪船招商局所屬輪船，1927年10月從上海出發前往香港途中，遭到偽裝乘客的海盜攻擊，被劫往大亞灣水域。當時英國海軍潛艦L4正在該水域執行巡邏任務，覺察到愛仁輪可能遭海盜劫持，故試圖攔截該輪，但並未成功；為了阻止愛仁輪逃竄，L4潛艦最後決定開砲攻擊，但卻造成愛仁輪中彈起火沉沒，船上華籍乘客有數十人因援救不及，不幸溺水身亡。參見“Report of Proceedings of H. Submarine from 18th to 21st October, 1927, by Lieutenant N.J.C. Halahan,” First Cruiser Squadron’s Letter, No. 297/005, 28 October 1927, CO129/515/1.

²⁶ 關於上述輪船劫案所造成的中英爭執與齟齬經過，可以參見筆者先前的兩篇論文。新寧輪劫案與雙美輪劫案交涉，參見應俊豪，〈五卅事件後中英合作防制廣東海盜問題交涉〉；愛仁輪劫案交涉，參見應俊豪，〈愛仁輪事件與國民政府外交部的處置對策〉，《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臺北：政大出版社，2016)，頁247-278。

及西江沿岸的海盜據點，展開軍事剿盜行動。除了派兵登岸燒毀村落以及船隻外，英軍亦曾動用艦砲轟擊村落，試圖以軍事報復手段，來對海盜產生威嚇與鎮懾作用。此類軍事行動，涉及到派兵登岸以及砲轟聚落，嚴重侵害到中國領土主權，爭議性甚強，自然又再度引起中英雙方的緊張關係。廣州當局為了抵制英國，甚至一度再發動反英輿論宣傳戰，渲染英軍屠殺行動造成慘案，希冀藉使煽動中國公眾輿論與群眾的反英情緒。²⁷

另外一方面，雖然中英關係尚稱不睦，但廣州當局內部還是有部分將領與英國私下往來密切，代表人物為李濟深。²⁸經由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璧約翰(J.F. Brennan, Acting Consul-General, Canton)多次敦促，希望廣州當局接受雙方合作剿盜後，李濟深接受璧約翰的安排，在1927年11月7日與英國海軍駐廣州情報官法瑞中校(Lieutenant Commander, C.M. Faure, Naval Intelligence Officer, Canton, 音譯)進行私下晤談。²⁹在此次晤談中，法瑞向李濟深提出中英軍事合作計畫：

- (一)由中方負責組織進剿海盜巢穴的軍事行動，英國海軍則配合粵方需求與實際情況支援軍艦，如進攻內陸水路海盜將派出淺水砲艦，如進攻大亞灣海盜則可派遣巡洋艦。
- (二)中方委任一名中國官員作為聯絡官，負責雙方聯繫事宜。
- (三)每次行動前，應由雙方召開會議確定細節，中方並在每艘支援的英國軍艦上派駐一名官員與引水人，英艦將配合中國官員的要求，執行砲轟等軍事行動。

李濟深認為英國計畫確實可行，但解釋由於其軍隊多派往北方作戰，只能調動少數有限的兵力參與剿盜行動。法瑞則表示粵軍兵力不足的問題其實不難克服，因為行動時可以由英國海軍砲艦率先進攻，對海盜巢穴發射高

²⁷ 應俊豪，〈1927年英國海軍武力進剿廣東海盜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1期(臺北，2014年5月)，頁149-210。

²⁸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展開北伐軍事行動後，李濟深任總司令部參謀長，率領兩師留守廣州，1927年5月又兼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可見北伐期間，李濟深為廣州極為重要的實力派人物。參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頁323-324。

²⁹ "J.F. Brennan, Acting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Miles Lampson,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17 November 1927, CO129/507/3.

爆彈(High Explosive, H.E.)，之後粵軍再進入巢穴包抄海盜即可。尤有要者，法瑞甚至不反對在行動時可於英國海軍軍艦桅桿上懸掛中國旗，以作為雙方合作的訊號。不過，法瑞坦言希望雙方軍事合作行動必須保密，李濟深應禁止廣東報紙刊載類似報導。李濟深同意英方要求，也準備派遣密探與軍隊執行剿盜計畫。³⁰

由上述李濟深與法瑞的晤談內容來看，可以得知在李濟深主政廣州後雙方關係確實已有了很大的改善，雙方並已針對軍事合作剿盜細節有了一定程度的共識。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璧約翰給英國公使藍浦生(Miles Lampson, British Minister, Peking)的報告中，即稱李濟深對於英國海軍所提的合作計畫，「原則上已勉予同意」。³¹

另外一方面，為了強化李濟深在廣州的地位，以便推動合作進剿海盜，香港總督金文泰(C. Clementi, Governor of Hong Kong)不惜在北京外交團的「反制海盜措施會議」上坦承雙方的互動情況：

李濟深將軍在廣州有相當的影響力，他也想要與英國保持友善關係。就在香港總督金文泰離開香港前，李濟深即已派遣特使前往香港拜會金文泰，並允諾會盡快處理海盜問題。金文泰認為如果列強聯合向廣州當局抗議施壓，將有助於強化李濟深的地位。³²

換言之，英國試圖聯合日、法、義、美等國一起對廣州當局施加外交壓力，讓李濟深得以挾外自重，以利推動後續的進剿海盜行動。

稍後，在李濟深離粵赴滬期間(1927年11月-12月間)，廣州政局陷入極度動盪不安的情況，先後歷經「張黃事變」與「廣州暴動」等重大事件，李濟深曾一度也失去對廣州的控制能力，所幸上述變故不久後即宣告弭

³⁰ "Interview with General Lee," by C.M. Faure, Lieutenant Commander, Naval Intelligence Officer, Canton, 7 November 1927, CO129/507/3.

³¹ "J.F. Brenan, Acting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Miles Lampson,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17 November 1927, CO129/507/3.不過後來因李濟深北上上海參與國民黨高層會議，加以陸續發生張黃事變與廣州暴動，中英軍事合作一事乃暫時無法落實。

³² "Minutes of A Meeting to Discuss Anti-Piracy Measures," held at the Japanese Legation at 11 a.m. Nov. 16, 1927,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1卷，F-0138/0180-0183。

平。³³1928年初，李濟深從上海重返廣州，在途經香港時，與香港總督金文泰進行私人晤談。李濟深表示希望在廣州重新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並與香港保持友好關係，他並向金文泰保證，將會盡快採取積極行動，掃蕩在大亞灣地區的海盜以及在汕尾的紅軍勢力。雖然對於李濟深是否能夠盡快履行諾言不無質疑，但香港總督金文泰還是深信其人真摯可信。³⁴英國殖民部在內部備忘錄中，也認為李濟深在歷經廣州暴動、重新掌權之後，已經原則同意與英國合作，共同處理海盜問題。³⁵

1928年2月底，先是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訪問廣州，備受禮遇。廣州當局並向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表示將會採取剿盜行動。英國殖民部認為此時雙方關係相當良好。³⁶3月初，李濟深正式訪問香港，³⁷港督金文泰親至碼頭迎接，香港「市內掛滿青天白日旗，中英睦誼聲浪，高唱入雲，全市熱鬧，恍如大紀念日」。在歡迎宴會上，金文泰高聲呼籲中英親善，強調廣東與香港休戚與共，希望廣州當局能夠解決土匪海盜問題，終止內戰、發展商務，讓雙方共享榮景。李濟深隨即呼應港督訴求，表示兩人私交甚篤，除可增進廣東與香港之關係外，也能促進中英親善，尤其彼此經濟依存，猶如「狼狽相依」，中英理應親善、相互諒解。³⁸最後，港督金文泰並親往廣州回拜李濟深，亦「備受各界人士歡迎」，廣州「通衢大巷，皆懸兩國國

³³ 在1927年11-12月間廣州當局極度動盪不安。張發奎、黃琪翔等人利用李濟深離粵赴滬開會之際，發動軍事政變奪占廣州(張黃事變)。不久後，張、黃麾下的葉劍英等部又與中共勾結，利用張、黃兩人忙於應付桂軍、粵軍攻勢的機會，又發動新一波的政變(廣州暴動)。但兩次政變俱告失敗，李濟深則於1928年初離滬返粵，重新主持廣州政局。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頁564-566。

³⁴ "Piracy in South China Waters," Roger Culver Tredwell,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Hong Kong & Macao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27 & 30 January 1928, RIAC/893.8007/44.

³⁵ "Minutes of Colonial Office," January 1928, CO129/507/3.

³⁶ "Minutes of Colonial Office," 29 February & 1 March 1928, CO129/507/3.

³⁷ 李濟深曾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中正總司令報告，此行乃是「赴港送英公使行，順晤港督」，見〈李濟深電蔣中正二日赴港送英公使順晤港督〉，1928年3月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12059。

³⁸ 東方社香港三日電，〈李濟深與港督會議：討論港粵間問題、英使已離港北上〉，《世界日報》，1928年3月4日，2版。

旗，市中觀者如堵，大有萬人空巷之象」。廣州當局各級重要官員亦出席港督歡迎會，會上演說均強調中英感情融洽，並將致力於香港與廣州之間的親善。³⁹

港督抵粵後，粵垣之中英親善已達絕頂，往年逼貼通衢之排英傳單，一律嚴令撕去，前以血與淚建築之沙基事件紀念碑，亦行拆毀，甚至六二三紀念，且將改易名稱，親英熱之熾烈如此。⁴⁰

金文泰訪粵期間，雙方官員並磋商推動無線電、航空、商業等經濟合作事宜。從上述廣州當局與英國大員彼此熱絡互訪、敦睦邦誼，一方面會商解決省港歧見，二方面則強化經濟合作，足見中英關係已有非常大的改善，特別是香港政府與廣東實力派李濟深之間確實有著極其友好的關係，自然有助於中英進一步合作處理海盜問題。

尤有要者，根據香港總督金文泰的報告，他與李濟深在 1928 年 3 月雙方會面時，又進行了一次私人晤談。李濟深向金文泰允諾「廣州當局有意清剿大亞灣周圍地區，並採取有效措施以掃蕩海盜與土匪」。而已受命負責指揮陸軍部隊清剿海盜的徐景唐，⁴¹也曾親口向金文泰表示廣州當局的進剿政策將會是「強而有力的」。⁴²至於廣東海軍司令陳策，則以實際行動，除派軍艦巡邏東江與西江水域，預防海盜犯案外，亦先後派出中山、廣庚、廣金以及海瑞等艦前往大亞灣東側海豐、陸豐、汕尾等地，進剿盤據當地的共黨勢力。⁴³

³⁹ 路透社廣州十日電，〈克萊孟德已由粵回港、日前曾與李濟深開會議〉，《世界日報》，1928年3月13日，2版。

⁴⁰ 東方社香港十一日電，〈克萊孟德已由粵回港、日前曾與李濟深開會議〉，《世界日報》，1928年3月13日，2版。

⁴¹ 徐景唐原為李濟深第4軍麾下將領，自1926年7月起任第13師師長兼第6警備區司令。1928年3月，徐景唐又受廣州政治分會任命為廣東「東區善後委員」，並擔任第5軍軍長。見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編審會，《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2），徐景唐條，頁826-827。

⁴² “C. Clementi,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 to Major General C.C. Luard, General Officer Commanding Troops, South China Command,” 7 May 1928, CO129/507/3.

⁴³ 〈海瑞艦開赴汕尾協剿共匪〉、〈江大艦太平新墟剿匪〉，《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3月5日，5版、3月14日，5版。

4月，李濟深率領廣州當局軍政要員再度抵達香港，⁴⁴李濟深與徐景唐兩人則又前往拜晤金文泰，雙方並就廣東海盜問題進行意見交換。因為李濟深率團在香港訪問期間，廣東水域附近恰巧又發生一起重大輪船劫案——新華輪劫案，⁴⁵該輪雖隸屬於輪船招商局，為懸掛華旗的中國輪船，故此劫案實際上與英國權益並無直接的關係，但香港總督金文泰還是趁機與李濟深商談海盜問題，建議以陸上軍事進剿行動來徹底解決為害甚烈的大亞灣海盜。⁴⁶金文泰並極力督促廣州方面應採取「立即有力的措施」來掃蕩大亞灣海盜，並表示海上行動並不足以根除海盜問題，而必須在陸上採取有系統、持續性的軍事行動。李、徐均向金文泰承諾將會立即採取行動，也認同金文泰的建議，必須強化陸上的軍事行動。⁴⁷在上述會談結束後，金文泰還特別通知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璧約翰，要求其繼續向李濟深溝通此事，強調「必須將大亞灣與汕頭之間的海盜、土匪與共黨勢力徹底清剿，如此方能重建廣東部份地區的法律與秩序」。⁴⁸

⁴⁴ 李濟深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之召，於1928年3月19日由廣州抵達上海，共商北伐大計。稍後，李濟深前往南京，受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總長，並代理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4月中，李濟深在返回廣州途中，順道前往香港拜晤香港總督。參見國史館，〈民國重要史事檢索系統〉，1928/3/19、3/30、4/7、4/17等日記載，(<http://210.241.75.208/newsnote/>)，2016年1月15日檢閱。

⁴⁵ 根據輪船招商局給廣州當局的報告，新華輪乃是在1928年4月13日從上海出發，預計前往廣州，但途中遭到約20餘名偽裝乘客的海盜襲擊，並將輪船劫往廣東大亞灣東南角的三洲口水域。海盜不但洗劫全船財物，並將船上5名乘客擄為人質(其中一人為輪船招商局視察員)。劫案發生後，輪船招商局即具函給廣州當局，希望協助緝捕海盜，追回遭擄去的5名人質與贓物。廣州市公安局乃下令偵緝課、保安隊及各區警署追緝新華輪涉案海盜。參見〈公安局嚴緝劫擄新華輪船匪黨〉，《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4月23日，6版。

⁴⁶ “C. Clementi, Governor, Hong Kong to the Consul-General, Canton,” 24 April 1928, CO129/508/4.

⁴⁷ 事實上自1928年3月晤談後，金文泰深覺廣州方面似乎並未在大亞灣採取有效的軍事進剿行動，且4月又再度發生一起大亞灣海盜劫案(即新華輪劫案)，故金文泰乃利用4月雙方再度晤談時又督促李濟深、徐景唐應該即刻採取行動。參見“C. Clementi,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 to Major General C.C. Luard, General Officer Commanding Troops, South China Command,” 7 May 1928, CO129/507/3.

⁴⁸ “C. Clementi, Governor, Hong Kong to the Consul-General, Canton,” 24 April 1928, CO129/508/4.

事實上，在中英關係逐漸改善的情況下，廣州當局即展現有意解決境內盜匪猖獗現象的決心，並開始有計畫地著手處理海盜問題。早在 1927 年底，廣東航政局即針對境內各江海盜進行調查，並徵求航商對於剿盜計畫的建議，以便提供給省政府參考。在廣東航政局局長給內河商船輪渡總工會的命令中，即表明有意掌握全粵內河水域的海盜活動情況：

粵省東、西、北三江水路綿遠、盜賊披猖，攔河搶劫擄勒之案，層見疊出，以致往來輪渡，近日紛紛停擺，交通稅收均蒙影響。現為維持交通稅收起見，擬請主管機關切實剿辦，毋令蔓延，致難收拾。惟是東、西、北三江各輪渡，所經航線之內，何處盜賊最多、何處最為險要，亟應先行查明核辦……列表呈復。對於剿匪計畫，仰並詳切條陳，以憑核實採納擇善施行。⁴⁹

姑且不論廣東方面宣稱的剿盜行動是否真的能夠有效解決海盜問題，究其實際，對於李濟深及其廣州當局來說，解決境內海盜問題，既可以對外改善與英國間的關係，同時也能對內暢通航運交通、充實稅收。

1928 年初，廣東陸軍最高軍事領導當局第八路軍總指揮部，鑑於各江輪船常遭海盜攔截情況，派遣軍隊嚴加剿辦以綏靖地方，故下令各地駐軍迅速填防，由第 5 軍駐防北江、第 15 師出防西江，同時也「酌撥艦隊分頭搜剿，俾交通早得恢復」。⁵⁰廣東海軍司令陳策也在李濟深的大力支持下，致力於強化海軍人力素質、汰除不當人員以及更新武器裝備，同時也規劃剿盜方案，準備擴編 500 人的海軍陸戰隊以協助剿盜事宜，並落實海軍分段巡邏計畫。《廣州民國日報》即稱：

海軍司令陳策……以廣東海軍各艦年耗餉楮不菲，各區盜匪如毛，而未聞各艦按段梭巡或緝辦，以致河道梗塞、商旅不安。陳氏……特決心將全部海軍大小各艦，認真整頓，除各艦從新劃一配置新式軍械外，並將所有不法員弁一律撤換……並已計畫大舉肅清上下游

⁴⁹ 〈航政局調查各江盜匪情況：並徵求航商對於剿匪計畫〉，《廣州民國日報》，1927 年 11 月 26 日，5 版。

⁵⁰ 〈保護各江航行之通令〉、〈第五軍奉調駐防北江〉、〈十五師部隊出防西江〉，《廣州民國日報》，1928 年 1 月 5 日，4 版；〈西路軍部隊剿滅西江股匪〉，《廣州民國日報》，1928 年 1 月 6 日，5 版。

河道土匪辦法，現由李主席准予編練海軍陸戰隊五百名，俾協助各艦剿辦海盜，並于西江……分設海軍司令部行營，以資就便調遣一切……及分段梭巡各項計畫。⁵¹

陳策要求所屬各艦應「常川往來保護航行之商船，並令各航商安心樂業，恢復原有之商運交通」，⁵²也鑑於廣東各江盜匪經常於河道要衝處設置水雷，圖謀炸船劫財，故派出海軍密探分赴各鄉訪查，以便掌握情資，防範海盜犯案。⁵³

三、北伐後期中中國調整剿盜態度的內外因素

不過，必須強調的，廣州當局開始積極處理海盜問題，並非僅是著眼於外部因素(亦即英國方面對於解決海盜問題的迫切需求與中英雙方關係的改善)，部份也是於內部考量，因為廣東本地船商本身同樣也深受海盜肆虐之苦，甚至在1928年1月時聯合向廣東省政府請願，希望能夠派遣軍隊駐防各商輪，以確保航行安全。廣州當局因此下令由軍事廳長徐景唐以及海軍艦隊司令部共同辦理護航防盜事宜。⁵⁴2月，徐景唐即派遣駐防東莞附近的第5軍與第13師抽調部份兵力前往東江、惠州一帶進剿盜匪。⁵⁵廣東海軍艦隊司令陳策則除派出20餘艘艦艇，分赴東江、西江及南路等盜匪猖獗處巡防，依照原先擬定安排的「劃分防段」、分區巡邏外，也持續派員督導巡視各江防務情況，一旦發現海盜犯案，隨即調派軍艦前往進剿。至於專責鞏衛地方治安，預計擴編的海軍陸戰隊一營，陳策也下令派艦專程前往瓊崖等處徵召兵力。⁵⁶

⁵¹ 〈陳策剿辦海盜之進行〉，《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1月11日，3版。

⁵² 〈海軍艦隊調回原防護航〉，《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1月27日，4版。

⁵³ 〈海軍司令部密查匪蹤〉，《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1月28日，4版。

⁵⁴ 〈加派軍隊護航〉，《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1月13日，6版。

⁵⁵ 〈徐景唐請剿東莞盜匪〉、〈徐景唐積極剿辦東江盜匪〉，《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2月23日，4版、2月25日，3版。

⁵⁶ 〈派員巡視各江兵艦〉、〈派艦赴瓊添招陸戰隊〉、〈海軍出巡艦隊剿辦盜匪〉，《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2月22日，4版、2月25日，4版。

1928年2月，在《廣州民國日報》一篇名為「訓政開始的廣東」的社論中，首先即是大談如何肅清廣東境內的盜匪，與將既有各地武裝團體改編地方警衛大隊，受地方行政長官的指揮控制。社論中，即倡議將剿盜行動劃分為四期，第一期解決廣州周圍的盜匪，第二期處理東路惠州、潮州、梅縣等地的盜匪，第三期處理南路欽州、廉州、瓊州等地的盜匪，第四期則是解決西江北路的盜匪。⁵⁷

3月13日，廣東政治分會正式公布〈廣東各區善後章程〉，其中第十一條即是有關肅清廣東盜匪問題的規定，強調「各區善後委員，應將所轄區內，劃分若干部，調遣軍隊，分途剿辦區內各處盜匪叛徒，限期肅清，並應限令各縣市長整理人民武裝團體、編辦保甲、清查戶口」，並規定「各地方軍警或人民武裝團體剿辦盜匪叛徒時，各縣市長應予協助」。⁵⁸

4月，廣東海軍司令部以東西江內陸水域盜匪現象猖獗，決定編組專責防盜艦隊，故成立「東西江艦隊」，任命李芳為艦隊長，由原海軍轄下「一二三等巡艦合併編成」，共計約30餘艘大小砲艦，負責處理「東西江內海匪」。⁵⁹同月，廣州當局並在全省展開大規模剿匪計畫，分別在東江、北江、西江、瓊島等四大方面派遣軍隊進剿盤據各地的盜匪。⁶⁰

至於李濟深、徐景唐當初承諾香港總督金文泰的進剿大亞灣海盜行動，則在1928年5月時有了更進一步的行動。根據香港警察的報告，是月廣州當局積極展開圍剿海盜行動，國民革命軍第5軍(徐景唐為軍長)派遣部隊包圍大亞灣沿岸稔山、平海、大洲等地著名的海盜據點，除焚燬兩個海盜村落、擊斃數名海盜外，還在稔山逮捕數十名海盜嫌疑犯，待掌握確切

⁵⁷ 〈訓政開始的廣東〉，《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2月9日，2版。

⁵⁸ 〈公布各區善後章程條例〉，《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3月14日，5版。

⁵⁹ 〈擬組東西江艦隊〉，《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4月13日，4版。李芳就任「東西江艦隊」艦隊長後，即開始積極分段派艦巡防西江，同時也多次派兵登陸剿盜，使得西江水域匪情受到控制，頗受商旅稱頌。至於東江水域，則因水位低淺，海軍砲艦不易駛入剿盜，故匪情持續猖獗。直至6月初東江水位高漲，李芳隨即率領江大艦以及兩艘小型淺水艦前往調查水文與匪黨分布位置，並派江順、東江、綏江三艦分區巡防。參見〈海軍艦隊巡防東海：分段派艦嚴密巡防〉，《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6月6日，4版。

⁶⁰ 〈剿匪消息續誌〉，《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4月20日，4版。

證據後即將其處死以儆效尤。此外，緊鄰香港東方的大鵬灣水域，廣州當局亦派遣警力順利拘捕勒贖香港漁民的數名海盜，隨後也將其中部份人犯處以死刑。⁶¹廣東海軍司令陳策稍後也擬定「剿辦大鵬灣海盜計畫」，並派員乘坐中山艦前往大鵬灣、大亞灣一帶觀察海盜據點以及搜集地方地理水文情報，以便未來出兵進剿之用。⁶²而為了根本解決大鵬灣、大亞灣海盜劫掠中外輪船等問題，在此剿盜計畫中，陳策決定駐兵、派艦與通訊三管齊下，在該灣要害處設置兵房、派遣砲艦兩艘常駐該處，並在高地架設無線電臺，一旦遇有海盜警訊，即可海陸協同策應。⁶³

簡言之，李濟深領導的廣州當局，無論如何終究在解決廣東海盜問題上展現了企圖心。《廣州民國日報》即公開強調李濟深的剿盜意志，以及海軍司令陳策配合調動所屬艦艇，規劃海陸協同軍事剿盜行動，以求徹底解決廣東境內的盜匪問題：

自李主席返粵後，軍民兩政，均有積極之設施，各區善後與綏靖事宜，亦均責令各區善後署及各地防軍負責規劃。惟以年來粵省各地匪患頻仍，商務行旅皆受障礙，且鑑於歷次防軍剿匪因不熟地方情形，此剿彼竄，徒糜軍實，殊非萬全之計。海軍司令陳策為迅肅匪氛起見，將海鷗、金馬、綏江、光華、海鷹、廣安等能出海之軍艦六十餘艘，分段梭游，視各區匪氛之重輕，以分配於四善後區域協

⁶¹ 此次軍事行動中，粵軍還救出1927年6月索爾維肯輪劫案(SS *Solviken* Piracy)中，遭到海盜綁架的5名人質。參見“Report from T. Murray, Chief Detective Inspector, Police Headquarter, Hong Kong,” 25 May 1928, CO129/507/3, CO129/508/4. 關於此次進剿行動，《廣州民國日報》亦有報導，稱「惠陽平海區素患匪風，海盜尤甚，省港往來貨船，多被劫截」，故是年5月1日第五軍軍長徐景唐乃派18師3團2營鄧仲生部前往進剿，「當場斃匪數名，擒獲十餘名、匪船數艘，並燒去數艘，繳獲槍枝數十桿」，並稱該區經此次進剿應該暫保安謐。參見〈各屬消息：惠陽〉，《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5月15日，9版。

⁶² 當時中國報紙常常將大亞灣(又稱拜亞士灣，乃取自英文Bias Bay音譯)誤稱為大鵬灣，乃因兩灣位置相當靠近，故常以大鵬灣泛稱惠陽南方水域(含括大亞灣)。事實上大鵬灣緊鄰香港新界，東則與大亞灣以大鵬半島為界。故報載稱陳策派艦調查大鵬灣海盜情況，可能即是泛指大鵬灣、大亞灣一帶。參見〈大鵬灣匪情調查員返省〉，《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6月6日，4版。

⁶³ 〈海軍司令部清剿大鵬灣盜匪之計畫〉，《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6月13日，3版。

助各處防軍，將匪黨水路夾擊，務使匪黨不能他竄。⁶⁴

加上李濟深本人曾對英國與香港多次表示親善之意，這也使得英國方面對於其評價甚高。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即盛讚李濟深是一位「純潔、單純的軍人」，在其治理下的廣東，建立了「反共體制」(“anti-communistic regime”)，而且也試圖處理反英抵制等問題。⁶⁵英文《中國年鑑》亦稱「跟前幾年相比，1928年與1929年前半年的海盜情況已有減緩，這主要歸功於香港政府與廣州當局的合作，特別是李濟深將軍」。⁶⁶日本在華官方英文報紙《華北正報》亦清楚觀察到中英關係的改善，特別是是從香港政府與李濟深熱絡互動中略窺一二：

廣東經最近亂事後，港方對李濟深前途，頗增樂觀，且希望其能樹立鞏固之政府，控制兩廣。李近於宴廣州領團之會，曾對各領聲言，彼願於轄內，實行建設工作，同時並對香港亦曾非正式表同樣之意。但港當局則盼李於言談之外，更有進行之機會。蓋港方對李之取締共黨，勦辦粵境海盜土匪，及解散罷工糾察隊，均認李氏此舉，含有充分誠意之證明，而其他各方，亦以為現時之港粵關係已有極佳之基礎，苟粵當局永久維持此地位，於港亦甚有利益，因此港政府幾已默示可以與李援助及合作……。⁶⁷

此外，廣州當局在1928年5月以後致力於進剿海盜，並藉此改善與英國的關係，其實也與國民革命軍北伐軍事行動受到日軍阻擾有著密切關係。4、5月間，北伐軍進入山東後即逐漸受到日本的壓力，5月3日先爆發濟南事變，9日濟南更遭到日軍強佔，中日關係陷入空前緊繃狀態。蔣中正在5

⁶⁴ 〈四善後區域將有軍艦梭游防盜〉，《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5月1日，3版。

⁶⁵ 不過，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也坦承李濟深之所積極處理反英抵制問題，實際可能與其個人利益密切相關。受惠於華盛頓會議同意增加的2.5%海關附加稅，只要能夠解決抵制問題，讓香港英貨順利從海關進口，自然即可以大幅增加廣州當局的收入。參見“Hongkong - The Changing Scene - The Piracy Problem - Trade - A Government Loan (From Our Correspondent),” 5 November 1927, *The Economist*, 105:4399 (17 December 1927), 22-23.

⁶⁶ H. G. W. Woodhead, ed., *The China Year Book, 1929-30*, p. 795.

⁶⁷ *The North China Standard*, cited from〈李濟深與港督會議：討論港粵間問題、英使已離港北上〉，《世界日報》，1928年3月4日，2版。

月 9 日給李濟深的電文中即強調「此事樞紐已不在軍事，而在外交，不在此地，而在有轉移能力者，祇有英國，望即派朱兆莘先生赴港與港督密談、徵其意見」。換言之，蔣中正試圖透過香港總督瞭解英國對中日衝突的態度，以弄清英日兩國對於日本出兵山東是否已事先有所協調與達成默契。蔣中正並在電文中明白告訴李濟深，如能運動香港總督，從而改變英國內閣對華決策，出面制止日軍行為，「則我方與優先經濟利益」。⁶⁸尤有要者，國民政府在清黨後與蘇俄正式決裂，為避免在國際上陷入孤立，蔣中正亦希望改善與英國的關係，使之成為「與國」：

總之，我國絕俄以後，應速覓與國以增強我國在國際上之聲勢，不可孤立也，望即圖之！千鈞一髮，不及待政府開會詳商，朱君(朱兆莘)前往有必要時用弟之代表名義，望兄(李濟深)與朱君斟酌進行，盼復，萬急萬急。⁶⁹

蔣中正坦言濟南事件後日軍氣勢洶洶，雖「吞淚忍辱、節節退讓」，但日本仍「步步進逼」，「國尚未亡，已受亡國待遇」，受此刺激，蔣中正自然急於尋求英國的諒解。無庸諱言，正是由於日本出兵山東阻擾北伐軍事行動之舉，迫使國民政府轉而尋求英國援助以抗衡日本，而香港總督正是國民政府亟欲拉攏的英國政要之一，冀圖透過其來影響英國政府政策。也因此，對於香港總督念茲在茲的廣東海盜問題，廣州當局自然得展現誠意與魄力，以示友好。簡言之，中日關係的緊張衝突，間接促成中英關係走向和緩。

即是之故，英國駐華官員對於廣州當局掃蕩海盜的決心，也從原先的質疑態度，逐漸轉趨肯定。英國駐廣州總領事璧約翰 6 月給北京公使的報告中，仍對廣州當局進剿海盜成效持保留態度。他認為大亞灣水域遼闊、海盜廣布，要徹底解決海盜問題，絕非偶爾一次的軍事行動即可奏效，因

⁶⁸ 〈蔣中正電李濟深即派朱兆莘赴港與港督密談請與其斟酌進行〉，1928年5月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33032。

⁶⁹ 〈楊勝治報告蔣中正日軍進逼大部佔馬鞍山一部進至東西十六里河我砲團已後撤，賀耀組報告辛莊火藥庫被擊毀等，熊式輝羅家倫交涉持回福田彥助二函報告福田態度強橫難與理論，蔣中正決再派何成濬持函往濟南做最後交涉並電李濟深解決濟南事變方針不在軍事而在外交惟有英固有此轉移能力望即派朱兆莘赴港徵求港督意見等〉，1928年5月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60100010009。

此必須觀察廣州當局能否持續掃蕩此區域的海盜，並將其置於永久控制之下。不過，璧約翰坦承廣州當局的行動畢竟是「一個好的開始，也超乎他的預期，因為先前已歷經多次令人失望的交涉結果。」⁷⁰到了7月時，璧約翰的態度明顯開始轉變，不諱言廣州當局確已「靠自己的力量，奮戰不懈地掃蕩大亞灣海盜」。⁷¹7、8月間，香港政府所作的廣東海盜現況報告中，也與璧約翰的觀感一致，認為廣州當局已「持續證明有心要掃蕩海盜」，派出軍艦有效地巡邏大亞灣水域，故雖然海盜事件依然頻傳，但顯然已有減少的趨勢。特別是為了掃蕩大亞灣海盜，廣州當局採取了諸多有效措施：在大亞灣設置一個無線電台與燃煤補給站，並派遣海軍艦艇在該水域適當地執行巡邏任務，同時也建造臨時軍營以便長期駐紮軍隊。更令香港感到欣慰的，是據聞廣州當局已解決大亞灣惡名昭彰的「非法之徒」，亦即將當地「保安團」解散並解除其武裝，而改代以正規軍駐防該地。⁷²

中英關係的改善以及廣州當局致力於掃蕩大亞灣海盜，也使得英國政府逐步調整自1927年起開始執行的武力懲罰政策。英商太古輪船公司(Butterfield and Swire, or China Navigation Co. Ltd)所屬德安輪劫案(SS *Tean Piracy*)發生之初，⁷³香港方面曾擬有由英軍進剿大亞灣海盜的方案，並準備

⁷⁰ “J. F. Brennan, Consul General, Canton to Sir Miles Lampson,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12 June 1928, CO129/507/3. 英國殖民地部此時同樣對於廣州當局解決大亞灣海盜問題的能力感到質疑。特別是從1928年4月的新華輪劫案(SS *Hsin Wah Piracy*)中，可以看出廣州當局無法有效制止大亞灣海盜犯案。因為事實上在劫案發生之前，香港即已掌握海盜情資，並將相關資訊告知廣州方面，但廣州當局顯然還是未能及時採取有效措施來清剿海盜據點，防止劫案發生。參見“Minutes of the Colonial Office on China Piracy—Individual Cases,” 20 June 1928, CO129/508/4.

⁷¹ “J. F. Brennan, Consul General, Canton to Sir Miles Lampson,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19 July 1928, CO129/507/3.

⁷² “Extract from A Despatch from the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26 July 1928, CO129/507/3; “Extract from Secret Despatch from the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20 August 1928, CO129/507/3

⁷³ 德安輪為英商太古輪船公司所屬輪船，於1928年5月從越南海防出航，預計經廣東北海、海南海口，前往香港。當德安輪行駛至海南海口港附近時，遭到挾帶武器登船、偽裝乘客的海盜襲擊。海盜稍後順利以武力壓制德安輪船上部署的印度武裝警衛，控制全船船員與乘客，並將輪船劫持至廣東大亞灣附近。該輪駛抵大亞灣後，因形跡可疑，引起大亞灣南方水域大三門島上海關人員的注意，在海關緝私艦永興艦以及當時在附近水域巡邏的英國海軍驅逐艦索姆號(HMS *Somme*)的合作下，成

由英國陸軍華南指揮部(South China Command)負責規劃。但廣州當局的軍事行動顯然令英國政府感到滿意，在殖民部給外交部的公文中，清楚表示由於廣州方面已經在大亞灣採取軍事進剿行動，不但成功消滅部份海盜，也援救出海盜事件中遭到綁架的受害者，所以英國政府沒有必要為了德安輪劫案再採取進一步的軍事行動。⁷⁴也因此，英國政府內部並不支持德安輪劫案受害船商太古輪船公司為此向中國政府提出求償。英國外交部即否決太古的求償要求，一方面是考量到法律層面的問題，因為劫案發生的位置並不位於中國水域範圍內，二方面則是顧及現實層面的務實考量，此乃因中國當局在此劫案的後續處置上，明顯展現出試圖解決海盜問題的決心與行動力。英國殖民部同樣也與外交部持相同看法，畢竟對英國政府來說，「當下最明智的(防盜)決策，就是盡可能與中國合作」。⁷⁵

四、北伐後期以降的中英合作防盜計畫：剿盜汽艇軍購案

為了遏制日益嚴重的海盜肆虐問題，廣州當局先後兩次委託香港造船業者建造專門用以防制內河水域海盜的汽艇，同時也要求英國方面提供艦艇所需的武器裝備。⁷⁶1928年英國海軍在評估第一次購船案時，雖然對於廣

功援救出德安輪。不過，部分涉案海盜，則趁亂登岸逃離，永興艦與索姆號追捕不及。關於德安輪劫案經過，參見Lieutenant, Officer of the Guard, HMS *Cornflower* to the Commanding Officer, HMS *Cornflower*,” 28 May 1928, CO129/508/4; “Piracy on SS *Tean* in Hoi How Harbor,” T. Murphy, Chief Detective Inspector to Chief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 Hong Kong, 29 May 1928, CO129/508/4;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29 May 1928, CO129/508/4.

⁷⁴ 不過，英國殖民部還是建議外交部，駐廣州總領事館仍應持續向廣州當局施壓，促成大亞灣地區的長期駐軍計畫以及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徹底掃蕩該區海盜勢力。“H. Beckett, Colonial Office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Office,” 1 August 1928, CO129/507/3.

⁷⁵ “Minutes of the Colonial Office on China Piracy—Individual Cases,” 13 December 1928, CO129/508/4.

⁷⁶ 〈堀代理公使ヨリ田中外務大臣宛〉，第64號，1929年1月19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2卷，F-0139/0251-0252；“J.F. Brenan, Acting

州當局購船動機與目的仍有所疑問，但覺得「至少這是令人振奮的消息，因為廣州官員明顯開始關注海盜問題，也願意出錢購置內河使用的武裝汽艇」。⁷⁷ 1928年1月，由英國外交部召開，殖民地(包括香港輔政司)、海軍部、陸軍部、空軍部、貿易委員會等部會代表共同參與的跨部會議中，同樣也不反對香港協助廣州當局購置汽艇，且流露出樂觀其成的態度。參與跨部會議的香港輔政司修頓(W.T. Southorn, Colonial Secretary, Hong Kong)認為小型海軍艦艇雖不適用於巡邏大亞灣水域，但是對於處理珠江三角洲海盜問題卻有相當作用，因此「他認為香港政府歡迎有機會能夠協助廣州當局獲得防盜武裝汽艇」。⁷⁸其次，在同月香港總督在給殖民部的報告中，又表示準備接受廣州當局的請求，同時也將出售小型海軍艦艇上所需的武器裝備。香港總督認為此項軍購案不但有助於強化防盜工作，也能夠「培養香港與廣州之間的友善關係」，故應予同意。殖民部在收到香港總督的報告後，傾向批准軍購案，並將此決定通知英國外交部、海軍部、陸軍部、空軍部等。⁷⁹

即是之故，1928年3月香港總督府與廣州當局達成的軍購協商內容，香港方面將不僅代為建造四艘艦艇，也將同時出售船上所需的武器裝備與彈藥。為確保此批軍購不被挪做他用，李濟深同意由外交部廣東特派交涉員朱兆莘正式照會英國駐廣州總領事，以書面形式保證軍購將只專門用於防盜工作。在收到照會後，香港政府將在約兩個月期間內，代為採購所需的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Miles Lampson, Minister, Peking," 28 April 1928, CO129/508/4.

⁷⁷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106 (15 March 1928), p.37, CO129/507/3.

⁷⁸ "Notes of A Meeting at the Foreign Office on Wednesday," 18 January 1928, CO129/507/3.

⁷⁹ "Telegram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Colonial Office," 28 January 1928; "Minutes of Colonial Office," 31 January 1928, CO129/507/3.英國政府內部似乎對於此項軍購有無抵觸華盛頓海軍限武條約感到有些爭議。關鍵之處在於這些武裝汽艇是否屬於「軍艦」("Vessels of War")。基本上，外交部認為此類汽艇不應屬於「軍艦」，但海軍部則似乎認為是屬於軍艦。參見"Minutes of Colonial Office," 27 February 1928, CO129/490.

武器裝備與彈藥。⁸⁰

依據 1928 年廣州當局與香港政府協商的軍購項目，分為艦艇、武器裝備與彈藥三大部份；並附帶有但書，此批軍購只能用於進剿海盜，不得用在其他戰事上。在艦艇部份，一共有四艘，設計上均為吃水較淺的內河艦艇，並使用新式的內燃機引擎，而非舊式蒸汽機引擎。武器裝備部份，則可細分為火炮(6 磅速射砲)、馬克沁機槍、步槍與手槍，除火炮乃是固定裝設在兩艘小型砲艦上以外，其餘武器則是專供在艦艇配屬人員使用。彈藥部份，則是採購了 60000 個步槍彈匣以及 20000 個手槍彈匣。其次，由於海軍軍購案事涉敏感，且可能抵觸列強對華軍火禁運協議，故在處理廣州與香港之間的海軍軍購時，英國駐華公使還特地將此案提交到北京外交團討論，以尋求認可。因此批軍購之艦艇武器裝備等限定只能用於剿盜之用，故基本上各國公使均表同意，唯獨日本駐華公使一開始持反對意見。日本公使特別反對上述最大一艘的砲艦，因為認為廣州當局極可能將其作為海軍附屬艦艇，使用於戰事之上。不過，在英國的疏通之下，日本最後還是撤回了反對意見。⁸¹

表1：第一次剿盜艦艇軍購案(1928年)

艦艇部份：4艘				
艦型	數量(艘)	噸位數	船長	吃水
小型砲艦	1	202	113呎	3呎9吋
小型砲艦	1	160	116呎	4呎
汽艇	2	50	84呎	2呎6吋

⁸⁰ “Extract from Enclosure 3 to Secret Despatch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lonies,” 8 March 1928, CO129507/3.

⁸¹ “Gunboats Building in Hong Kong for Canton Regime,”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 J.V.A. MacMurray,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23 November 1928, RIAC 893.8007/50.這四艘小型艦艇後來由廣東海軍司令部以紀念革命先烈，分別取名為仲元、堅如、執信等。參見〈海軍新艦將舉行進水式〉，《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4月13日，4版。

武器裝備部份		
武器類型	數量	說明
火炮(速射砲)	2	Hotchkiss Q-F Guns (6 Pounders)
機槍	12	Maxim Machine Guns (4 with tripods)
步槍	60	Infantry Rifles
手槍	20	Mauser Pistols
彈藥部份		
彈藥類型	數量	
步槍匣	60000	
手槍匣	20000	

事實上，根據香港總督府給殖民部的機密報告，李濟深除了提出 4 艘防盜艦艇及附屬武器裝備彈藥採購案外，同時也表示有意購買英國現役軍艦——鵝級砲艦知更鳥號(HMS *Robin*)。⁸²不過英國方面顧及到華盛頓海軍限武條約的規定，後來婉拒了李濟深的要求。香港總督府則另外提出替代性方案，建議將目前由英國海軍租用並部署有武器裝備的 3 艘武裝汽艇，轉移給廣州當局使用，以處理西江水域的海盜問題。⁸³

1929 年 1 月初，英國駐華公使又在北京外交團提出中英之間第二次剿盜艦艇軍購案。跟前次相比，數量從 4 艘減為 2 艘，艦艇平均噸位數也比較小，但在武器裝備部份則似乎更為強化。在 1928 年軍購案中，只有噸位

⁸² 鵝級砲艦知更鳥號為淺水內河砲艦，當時隸屬於英國海軍「中國艦隊」麾下的西江分遣艦隊。該艦建造於 1897 年，排水量 150 噸，擁有約 550 匹馬力，航速約 7-13 節，艦上武器裝備有 6 磅砲與機槍。相關資料，可以參見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106 (15 March 1928), p.28 & 31, CO129/507/3; Parkes O. and Maurice Prendergast ed., *Jane's Fighting Ships*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1919), 93-94. (http://freepages.genealogy.rootsweb.ancestry.com/~pbtvc/Janes_1919/Index.html) Online Data.

⁸³ 至於當時由英國海軍租用的三艘武裝汽艇，則分別為 *Faulkner*、*Onslaught*、*Nessus*。參見“Extract from Enclosure 3 to Secret Despatch for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lonies,” 8 March 1928, CO129507/3.

數較大的兩艘小型砲艦裝設有火砲，其餘兩艘汽艇並未裝設火砲，但在 1929 年軍購案中，則在較大的一艘汽艇上特別裝設有兩門小型火砲(3 磅砲)，並均搭配維克斯(Vickers)與李維斯(Lewis)機關槍。⁸⁴

表2：第二次剿盜艦艇軍購案(1929年)

艦艇部份：2艘				
艦型	數量(艘)	噸位數	船長	吃水
大型汽艇	1	46	94呎	3.9呎
小型汽艇	1	27	60呎	2.9呎
武器裝備部份				
武器類型	數量	說明		
火砲	2	3 Pounder Guns		
機槍(1)	4	Vickers Machine Guns		
機槍(2)	6	Lewis Guns		
特別速射槍	12			
彈藥部份				
彈藥類型	數量			
炸裂彈	1000			
機槍彈	50000			

五、北伐後期以降英國對中國處理海盜問題的觀感

整體來說，北伐後期以降廣州當局所推動的海軍巡邏計畫，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逐漸贏得英國方面的信賴。根據英國海軍駐西江巡邏分遣艦隊指

⁸⁴ 〈堀代理公使ヨリ田中外務大臣宛〉，第65號，1929年1月19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2卷，F-0139/0252-0253。

揮官克拉克中校(Commander M.L. Clarke, Senior Naval Office, West River, 音譯)在 1928 年 4 月所作的評估報告,廣州當局的巡邏架構,是由 2-3 艘小砲艦以及大量小型武裝汽艇混合編組而成(一共 24 艘艦艇),主要任務以被動性防禦為主(亦即巡邏水域預防海盜案件的發生),偶爾才會發動主動攻擊進剿海盜。⁸⁵雖然反盜成效如何似乎還無法確定,但是克拉克認為自巡邏計畫開始施行以來,乘客對於珠江三角洲水域的航行安全確實已恢復信心;而且不只在防盜任務上,即使在商船觸礁事故時,廣州巡邏艦艇也會趕到現場提供適當的保護,顯見巡邏計畫正忠實地執行著。尤有要者,為了預防海盜案件,廣州巡邏艦艇也開對於行跡可疑的外國船隻(意指向外國政府註冊、懸掛外旗的船隻,但船主不見得是外國人)進行攔停,拒絕配合的船隻則會遭到開火攻擊。關於此類攔停行動,也曾一度使得英國海軍當局陷於難以抉擇的窘狀。客觀上來說,要執行防盜任務,巡邏艦艇就必須對所有可疑船隻進行攔停,而拒絕配合的船隻相當有可能就是遭到海盜挾持,所以後續的動武攻擊行動也是合理的,否則無法有效制止與嚇阻海盜行為。然而,問題是英國在華享有領事裁判權與內河航行權,如果接受廣州巡邏艦艇的攔停行動,等於就是默認中國對英國船隻的執法權。自清季亞羅船事件以來,此類爭議一直是中英之間的敏感問題,在歷經了英法聯軍之役,更是自此確立英國船隻無論如何不容中國官方干涉的主要原則。不過,在權衡厲害得失後,克拉克中校最終還是向海軍當局建議應尊重廣州巡邏艦艇的攔停英船行動。如果英國堅決拒絕此類攔停行動,恐將導致現行防盜成效大為倒退。屆時一旦在珠江三角洲發生英船劫案,廣州當局則可以理所當然地規避調所有的責任,而將其歸咎於英船的不配合。因此,克拉克認為:

雖然無論如何我們不可能接受中國砲艦對於英國船隻有臨檢之權,但是由於廣州政府為目前的執政當局,同時也已盡力清剿海盜,所以我們應該建議英國船隻以友善的態度而非敵意來看待中國巡邏艦艇。

⁸⁵ 1928年4月時,廣州海軍江大艦艦長還曾將當年2月份巡邏計畫的詳細調度表提供給克拉克中校參考。克拉克隨即將其翻譯成英文,呈報給英國海軍駐香港准將。巡邏計畫艦艇調度表參見“Schedule of Patrols of Various Gunboats in East and West Rivers Issued by Gunboat *Kong Tai* Dated 11 February 1928,” CO129/508/4.

克拉克的建議，也獲得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璧約翰的認同。⁸⁶璧約翰在給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的報告中，即認為廣州當局的購船、巡邏等防盜措施，對增進省港貿易應該有相當正面的作用。⁸⁷

英國殖民部也對廣州當局在珠江三角洲水域執行例行性防盜巡邏任務，感到相當興奮。在殖民部內部備忘錄中，即表明廣州當局所推動的巡邏計畫，雖然「依照我們(英國)的標準，不太令人滿意，但是無庸置疑的，巡邏將會有助於恢復(外人對其防盜的)信心」。⁸⁸

此外，稍後在 1928 年 12 月上旬發生的黃石公輪劫案善後處置中，同樣也可以看到廣州當局對於海盜問題的積極態度。黃石公輪屬於廣州黃行興輪船公司，乃是在廣州註冊的華籍輪船，懸掛華旗，平常經營往來香港、西貢間的貨物運輸航線。該輪在從香港前往西貢途中，於 12 月 11 日在澳門西南方水域，遭到船上部份伙夫與偽裝乘客的海盜合謀劫持。該輪隨之被海盜控制，並駛往的澳門西南方 30 餘哩的三浪島、臯蘭島(約在廣東台山外海附近)。待黃石公輪脫困駛返香港之後，香港警察立即展開一系列的調查行動，除徹底搜查輪船外，也將船上船員、乘客等拘留偵訊，並發現策劃此劫案的海盜巢穴位於三浪島北方一處丘陵地的「海盜要塞」(“Pirate's Fort”)之中。雖然黃石公輪屬於華輪，並非英輪，但因劫案地點在香港周邊水域，該輪又專營香港航線，故引起香港政府的重視，也立即將此一劫案與相關海盜資訊通知廣州警方。而廣州海軍當局則在稍後對臯蘭島、三浪島海盜據點發動軍事進剿行動。根據廣州當局事後給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

⁸⁶ 除了條約特權的爭議外，克拉克中校坦承讓廣州巡邏艦艇對英船執行攔停與臨檢也可能會有其他風險。例如海盜船有可能偽裝成官方的巡邏艇，藉口攔停英船，實則劫船。不過，一來此類情況發生的機率不是很大，二來即使遇到，還是可以事先採取預防措施，例如建議英船在遭到攔停時，船隻依然保持動力，同時也派出隨船武裝警衛保持警戒，如此一旦發生前述情況時，即可以擊退試圖登船的海盜或是迅速開船逃離。參見“M.L. Clarke, Commander,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20 April 1928, CO128/508/4.

⁸⁷ “J.F. Brenan, Acting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Miles Lampson, Minister, Peking,” 28 April 1928, CO129/508/4.

⁸⁸ “Minutes of the Colonial Office on China Piracy—Individual Cases,” 20 June 1928, CO129/508/4.

的訊息，此次軍事行動共計擊斃海盜 40 名、焚燬海盜村落 5 座。⁸⁹

即是之故，英系報紙對於李濟深、陳策等廣州領導當局對在剿盜工作上的成效，有著相當樂觀的期盼。英文《北華捷報》即引述香港方面的消息，以「廣州好樣的」（“Canton’s Good Work”）來稱呼廣東在剿盜上的努力以及進步。特別是近來廣州海軍司令陳策積極派遣軍艦前往大亞灣、汕尾一帶去處理海盜問題，相當令人激勵。而在香港訂製的反盜艦艇，也使得廣州海軍在進剿海盜時，有更好的武器裝備。雖然英國等外國海軍早已在大亞灣水域建立聯合巡邏體系，但要永久解決海盜問題，還需要更密集的派遣海軍艦艇在海盜淵藪之地鎮壓。簡言之，《北華捷報》認為廣東情況雖然已有相當顯著的進步，但中國如果要讓世界刮目相看，最好的方式莫過於去徹底肅清大亞灣海盜問題，而廣州當局似乎正是最適合做這些事之人。⁹⁰

1929 年 3 月，李濟深在上海接受英文《字林西報》記者的訪問，即曾驕傲地誇耀廣東的情況，表示西江與大亞灣的海盜問題已大致解決，共黨活動也遭到有效壓制：

李將軍表示，不誇張地說，廣東目前是全国行政情况最好的省分。一切都和平，即使过去也从未如此和平。事实上，他认为甚至比上海还要和平，因为在广东没有武装强盗与绑匪，西江与北江区域的盗匪已剿灭成功，而大亚湾海盗则已肃清。广东现在已无共党与红色苏联份子活动，莫斯科的影响已遭到根除。⁹¹

李濟深對英國報社記者的談話，雖然明顯帶有誇耀意圖，但似乎也想藉此向英國清楚表明其反共與致力於解決海盜問題的兩大立場。

同樣地，1929 年初，日本駐香港總領事村上義溫也注意到隨著中英關

⁸⁹ “Cecil Clementi, Governor, Hong Kong to L.C.M.S. Amery, Colonial Office,” 14 January 1929, CO129/513/8; “Police Report I on the Piracy of SS *Wong Shek Kung*,” from A.J.W. Doring, Sub-Inspector, Office in Charge, Crimin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Tsimshatsui to the Deputy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 Kowloon, 20 December 1928, CO129/513/8; “Police Report II on the Piracy of SS *Wong Shek Kung*,” from T. Murphy, 2nd Assistant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 to the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 December 1928, CO129/513/8.

⁹⁰ “Canton’s Good Work,” *The North China Herald*, 26 January 1929.

⁹¹ “General Li Chi-Sen Non-Committal: Enthusiastic Over Canton; Be Constructed Enforced,”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6 March 1929.

係的改善，廣州當局致力於防範海盜，且已有相當成效：

由於兩廣治安的逐漸平靜，加上排英運動的停止，廣州當局已經逐步充實巡邏艇來防範與鎮壓海盜……(使得香港無須再自行編制武裝快艇巡邏隊來保護英船往來香港與兩廣間的航行安全)。⁹²

特別是對於最猖獗的大亞灣水域海盜問題，中國海陸軍事當局也一改以往漠不關心的態度，而開始展開軍事行動，由海軍艦艇每月巡邏該水域一至二次，以及派遣陸軍部隊進行沿岸掃蕩工作。雖然廣東方面並未與英國共同進剿海盜，但上述行動畢竟已稍微展現廣州當局有試圖解決大亞灣海盜問題的傾向。⁹³

六、結語

1920年代的中英關係，呈現出震盪起伏的態勢，英國念茲在茲的廣東海盜問題處置，自然也隨之波動不定。1920年代前半期，英國(香港)與廣州當局的關係相當曖昧複雜，香港總督府表面上維持中立，實則偏向陳炯明，而與孫文不甚親睦。但是隨著陳炯明叛變，孫文北走上海，後來的情勢發展，卻又有很大的轉變。在驅逐陳炯明勢力、重回廣州後，孫文竟就此改變了對英國的態度，透過陳友仁的居中聯繫，雙方在合作處理海盜問題上有了私下的默契，由英國海軍與粵軍李福林部共同負責執行剿盜與防盜任務。但是好景不長，受到商團事件以及關稅分配權之爭的影響，廣州當局與英國關係又極度緊張，英國一度派遣軍艦在白鵝潭進行海軍武嚇行動，

⁹² 〈西江巡邏艇ノ廢航ニ關スル件〉，在香港總領事村上義溫ヨリ外務大臣田中義一宛，1929年2月16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2卷，F-0139/0253-0254。

⁹³ 據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的調查，香港華文報紙率先刊載中國軍事當局在大亞灣水域展開軍事行動的消息，但經其與英國海軍當局查證，關於防制大亞灣海盜問題，中英之間並無特別聯繫或有所協定。換言之，中國並未與英國海軍當局合作進行剿盜，此次行動應是中國單方面的行動。參見〈支那陸海軍當局ノ「バイアス」灣海賊警備狀況ニ關スル件〉，在香港總領事村上義溫ヨリ外務大臣田中義一宛，1929年3月29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2卷，F-0139/0254-0255。

雙方稍後更是幾乎擺出武裝對峙的態勢，衝突一觸擊發。⁹⁴後來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隨著孫文北上與病故，以及五卅事件的爆發，中英關係又陷入更為深沈的低潮，特別是省港大罷工以及對英經濟抵制運動的展開，使得雙方往來幾近中斷，原先推動一年多的合作處理廣東海盜計畫，自然也就只能草草作收。到了北伐初期，廣州國民政府將重心放在北伐軍事行動上，更是無心也無餘力與英國一同處理廣東海盜問題。也因此，英國在1927年一度採取極為激烈的手段，無視中國主權，逕自動用海軍艦隊與陸軍部隊侵入中國領海與領土，進剿廣東海盜據點，焚燒村落與船隻。然而就在此時，國民政府內部的權力鬥爭與路線調整，也開始有了新的變化，蔣介石發動了清黨，黨內的中共勢力遭到清算，也因此與蘇俄交惡，並開始向英、美靠攏。在將中共等激進勢力被排除後，國民政府也間接逐漸改變了北伐以來，透過輿論攻勢、動員群眾，甚至不惜採取暴力路線，挑戰條約列強在華的特殊地位(尤以收回外國租界等為主要手段)的作法，轉而與英美等西方列強以和平協調的方式，重新架構中外關係。在這樣的權力政治天平上，中英關係又重新回到了正軌，不論是英國方面，還是國民政府，都開始正視彼此的外交關係。自此，英國開始尊重中國主權，不再任意動用武力剿盜，國民政府也不再肆意發動反英宣傳。而到了北伐中後期，情勢又再度將中英關係更緊密的抓在一起，因為日本開始在山東介入阻止北伐軍事行動的進展。在蔣介石的定計下，國民革命軍避免日軍直接衝突，而致力於尋求外交手段來處理中日問題。此時英、美等列強的地位，更是舉足輕重，因為就國民政府而言，面對日本的強勢進逼，除了過去聯合英、美以制日的傳統思維外，似乎也不太可能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也因此，國民政府不但不再適合反英，反而更需要英國的支持，以作為抗衡日本的後盾。所以中英關係更進一步強化，而在這樣友善的大環境之下，香港總督府極力想

⁹⁴ 關於商團事件與關稅分配權之爭，參見張俊義，〈英國政府與1924年廣州商團叛亂〉，《廣東社會科學》，第3期(廣州，2000.06)，頁100-108。；“Letter of Proceedings-October 1924, 1924” from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6 November 1924, FO371/10916.

要解決的廣東海盜問題，終於再度被擺上了中英交涉檯面上。

北伐後期以降，廣州方面在李濟深的主導下，即開始慎重處理廣東海盜問題，除了形式上維持中英共同合作處理海盜事宜外，同時為了避免外界與政府內部對於英國介入廣東內政的質疑，廣州當局也開始積極規劃清剿海盜計畫，並派出海陸武力進攻海盜據點，一來既能對英國有所交代，二來也避免英國以此為藉口，從而介入廣東海盜事務的處理。尤有要者，由於南北分裂以及各省軍閥內戰，一戰後列強對華實行軍火禁運，⁹⁵但是在處理海盜問題的大前提下，英國與香港政府開始協助廣州方面取得亟需的剿盜利器，例如新型的小型砲艦與武裝汽艇，以充作珠江水域的防盜緝盜之用。這也使得香港與廣州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發展到武器與軍火交易的層次。簡言之，自北伐後期以降，在中英關係改善的大前提下，廣州當局積極與英國合作處理海盜問題，終於使得廣東海盜勢力在1920年末期逐步獲得控制。

不過，也必須強調的是，在當時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大歷史背景下，隨著國民政府權力中樞北遷，李濟深作為留守廣東的軍事實力派，他之所以願意向英國釋出善意，並針對英國急於解決的海盜問題，採取比較積極的措施處理，背後可能也帶有現實政治的考量。因為如能與英國與香港保持友善關係，對於李濟深在廣東勢力的穩固，應該有所助益。特別是廣東緊鄰香港，彼此經貿利益密不可分，就李濟深來說，如能盡快改變五卅事件以來對英的敵對態度，減緩過去經濟絕交、省港大罷工期間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強化中英關係，促進省港兩地貿易往來，對於厚植廣東的經濟實力，自然也是很有利之事。而北伐後期濟南事變的發生，則更是讓李濟深可以堂而皇之地，繼續改善與英國的關係，強化合作剿盜。如果說當李濟深在1927年開展與英國的友善關係以及推動剿盜行動，或許只是其個人初步的破冰之旅，然而受到濟南事變的影響，1928-1929年推動的中英軍購計畫，

⁹⁵ 關於一戰後列強對華軍火禁運政策，可以參見陳存恭，《列強對中國軍火禁運(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則體現著中英提攜與合作剿盜，因為此時維持對英的友好關係，已不再僅是李濟深個人的決定，而是國民政府必須拉攏英國以抗衡日本的重要國策。更為重要的是，如同1924年間廣州當局重要領導人物孫中山、陳友仁、李福林所採取作法一樣，利用推動中英合作處理海盜問題，不但可以改善中英關係，也能藉著軍事剿盜為由，強化彼此的軍事合作與互信，以便透過香港之手，取得英國更為先進的軍事武器、彈藥或裝備。⁹⁶廣州當局兩次向英國提出的軍購計畫，包含艦艇與軍火，名義上雖然為剿盜之用，但實際上卻能進一步擴充李濟深麾下的軍事實力，不只可用於剿盜，還能提高其對廣東或是其他地方的威嚇與控制力。此外，藉由剿盜的名義，也能夠進一步派遣海、陸軍深入廣東各地，瓦解或收編一些中、小型地方割據勢力，強化對地方上的掌握。⁹⁷

⁹⁶ 1924年在孫中山授意下，陳友仁曾以中英軍事合作剿盜為由，向英國要求軍事貸款，用以購買武器與軍事裝備。之後李福林正式展開剿盜行動後，香港總督府也曾以秘密預算，支付部份剿盜開支。參見“Piracy and Anti-Piracy Operation,” An Extract from the Letter of Proceedings for the Month of October Addressed by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of the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at Hong Kong, 6 November 1924, FO371/10932;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24/202: 0024.

⁹⁷ 李福林在1924-1925年與英國合作進行的剿盜行動，可能即帶有假借剿盜之名，行擴大個人地盤之實。參見應俊豪，〈1924-1925年英國政府處理廣東海盜問題的策略運用：中英軍事合作剿盜行動〉，《國史館館刊》，第37期，頁1-48。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英國殖民部檔案(*The Colonial Office, CO129*, 香港公共圖書館藏微捲檔案)

- “A Draft Note from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to the Ministers for Foreign Affairs, Na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June 1929, CO129/515/1.
- “Anti-Piracy Measures,” by Rear Admiral, Hong Kong, June 1930, CO129/521/3.
- “C. Clementi,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 to Major General C.C. Luard, General Officer Commanding Troops, South China Command,” 7 May 1928, CO129/507/3.
- “C. Clementi, Governor, Hong Kong to the Consul-General, Canton,” 24 April 1928, CO129/508/4.
- “C. Clementi, Governor, Hong Kong to L.C.M.S. Amery, Colonial Office,” 14 January 1929, CO129/513/8.
- “Extract from A Despatch from the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26 July 1928, CO129/507/3;
“Extract from Secret Despatch from the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20 August 1928, CO129/507/3
- “Extract from Enclosure 3 to Secret Despatch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lonies,” 8 March 1928, CO129/507/3.
- “H. Beckett, Colonial Office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Office,” 1 August 1928, CO129/507/3.
- “Interview with General Lee,” by C.M. Faure, Lieutenant Commander, Naval Intelligence Officer, Canton, 7 November 1927, CO129/507/3.
- “J. F. Brenan, Consul General, Canton to Sir Miles Lampson,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12 June 1928, CO129/507/3.
- “J. F. Brenan, Consul General, Canton to Sir Miles Lampson,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19 July 1928, CO129/507/3.
- “J. F. Brenan, Acting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Miles Lampson,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17 November 1927, CO129/507/3.
- “J. F. Brenan, Acting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Miles Lampson, Minister, Peking,” 28

- April 1928, CO129/508/4.
- “Lieutenant, Officer of the Guard, HMS *Cornflower* to the Commanding Officer, HMS *Cornflower*,” 28 May 1928, CO129/508/4.
- “M. L. Clarke, Commander,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20 April 1928, CO128/508/4.
- “Memorandum on the Searching of Chinese Passengers for Arms,” by R.F.C. Hedgeland, Commissioner of Customs, Canton, 17 November 1927, CO129/507/3.
- “Minutes of Colonial Office,” 27 February 1928, CO129/490
- “Minutes of Colonial Office,” 29 February & 1 March 1928, CO129/507/3.
- “Minutes of Colonial Office,” 31 January 1928, CO129/507/3.
- “Minutes of Colonial Office,” January 1928, CO129/507/3.
- “Minutes of the Colonial Office on China Piracy—Individual Cases,” 20 June 1928, CO129/508/4.
- “Minutes of the Colonial Office on China Piracy—Individual Cases,” 13 December 1928, CO129/508/4.
- “Notes of A Meeting at the Foreign Office on Wednesday, ” 18 January 1928, CO129/507/3.
-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29 May 1928, CO129/508/4.
- “Piracy on SS *Teau* in Hoi How Harbor,” T. Murphy, Chief Detective Inspector to Chief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 Hong Kong, 29 May 1928, CO129/508/4.
- “Police Report I on the Piracy of SS *Wong Shek Kung*,” from A.J.W. Doring, Sub-Inspector, Office in Charge, Crimin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Tsimshatsui to the Deputy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 Kowloon, 20 December 1928, CO129/513/8.
- “Police Report II on the Piracy of SS *Wong Shek Kung*,” from T. Murphy, 2nd Assistant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 to the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 December 1928, CO129/513/8.
- “Report from T. Murray, Chief Detective Inspector, Police Headquarter, Hong Kong,” 25 May 1928, CO129/507/3, CO129/508/4.
- “Report of Proceedings of H. Submarine from 18th to 21st October, 1927, by Lieutenant N.J.C. Halahan,” First Cruiser Squadron’s Letter, No. 297/005, 28 October 1927, CO129/515/1.
- “Schedule of Patrols of Various Gunboats in East and West Rivers Issued by Gunboat *Kong Tai* Dated 11 February 1928,” CO129/508/4.
- “Telegram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Colonial Office,” 28 January 1928,

CO129/507/3.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106 (15 March 1928), p.37, CO129/507/3.

(二)英國外交部檔案(*The Foreign Office, FO37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微捲檔案)

“Letter of Proceedings- October 1924, 1924” from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6 November 1924, FO371/10916.

“Piracy and Anti-Piracy Operation,” An Extract from the Letter of Proceedings for the Month of October Addressed by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of the West River to the Commodore at Hong Kong, 6 November 1924, FO371/10932.

“Situation in China,” Minutes of Foreign Office, April 1924. FO371/10243.

“Telegram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23 November 1926, FO371/11671.

L. H. V. Booth, Assistant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 Hong Kong, “Precis of Piracies Committed by Bias Bay Pirates since 1921,” FO371/11671.

(三)英國內閣檔案(*The Cabinet Paper, CAB*)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24/202: 0024.

(四)英國香港立法局文件(*Sessional 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SP*)

“Letter from Civil Administrator, Kwangtung, to H. M. Consul-General, Canton,” 8 May 1914, *SP 1927*, No.7, p. 150.

“Letter from Commander-in-Chief , Kwangtung, to H. M. Consul-General, Canton,” 9 January 1923, *SP 1927*, No.7, 152-153.

(五)美國國務院中國國內事務檔案(*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 RIAC*)

“Gunboats Building in Hong Kong for Canton Regime,”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 J.V.A. MacMurray,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23 November 1928, RIAC 893.8007/50.

“Piracy in South China Waters,” Roger Culver Tredwell,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Hong Kong & Macao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Peking &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27 & 30 January 1928, RIAC/893.8007/44.

(六)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

〈蔣中正電李濟深即派朱兆莘赴港與港督密談請與其斟酌進行〉，1928年5月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33032。

“Jiang Zhongzheng dian Li Jishen ji pai Zhu Zhaoxin fu gang yu gang du mi tan qing yu qi zhen zhuo jin xing(1928.05.09),” Guo shi guan cang,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wen wu*, dian cang hao 002080200033032.

〈楊勝治報告蔣中正日軍進逼大部佔馬鞍山一部進至東西十六里河我砲團已後撤，賀耀組報告辛莊火藥庫被擊毀等，熊式輝羅家倫交涉持回福田彥助二函報告福田態度強橫難與理論，蔣中正決再派何成濬持函往濟南做最後交涉並電李濟深解決濟南事變方針不在軍事而在外交惟有英國有此轉移能力望即派朱兆莘赴港徵求港督意見等〉，1928年5月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60100010009。

“Yang Shengzhi bao gao Jiang Zhongzheng ri jun jin bi da bu zhan Maanshan yi bu jin zhi dong xi Shiliuli he wo pao tuan yi hou che, He Yaozu bao gao Xinzhuang huo yao ku bei ji hui deng, Xiong Shihui Luo Jialun jiao she chi hui Fu tian yan zhu er han bao gao Fu tian tai du qiang heng nan yu li lun, Jiang Zhongzheng jue zai pai He Chengxun chi han wang Jinan zuo zui hou jiao she bing dian Li Jishen jie jue Jinan shi bian fang zhen bu zai jun1 shi er zai wai jiao wei you ying guo you ci zhuan yi neng li wang ji pai Zhu Zhaoshen fu gang zheng qiu gang du yi jian deng(1928.05.09),” Guo shi guan cang,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wen wu*, dian cang hao 002060100010009.

〈李濟深電蔣中正二日赴港送英公使順晤港督〉，1928年3月2日，國史館藏，《蔣

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12059。

“Li Jishen dian Jiang Zhongzheng er ri fu gang song ying gong shi shun wu gang du,” Guo shi guan cang,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wen wu, dian cang hao* 002090103012059.

(七)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

“Minutes of A Meeting to Discuss Anti-Piracy Measures,” held at the Japanese Legation at 11 a.m. Nov. 16, 1927,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1卷，F-0138/0180-0183。

“Minutes of A Meeting to Discuss Anti-Piracy Measures,” held at the Japanese Legation at 11 a.m. Nov. 16, 1927, *Nihon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Shina kaizoku kankei zakken, dai 1 kan*, F-0138/0180-0183.

〈堀代理公使ヨリ田中外務大臣宛〉，第64號，1929年1月19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2卷，F-0139/0251-0252。

“Hori dairikōshi yori Tanaka gaimudaijin ate,” dai 64 gō, 1929.01.19, *Nihon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Shina kaizoku kankei zakken, dai 2 kan*, F-0139/0251-0252.

〈堀代理公使ヨリ田中外務大臣宛〉，第65號，1929年1月19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2卷，F-0139/0252-0253。

“Hori dairikōshi yori Tanaka gaimudaijin ate,” dai 65 gō, 1929.01.19, *Nihon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Shina kaizoku kankei zakken, dai 2 kan*, F-0139/0252-0253.

〈西江巡邏艇ノ廢航ニ關スル件〉，在香港總領事村上義溫ヨリ外務大臣田中義一宛，1929年2月16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2卷，F-0139/0253-0254。

“Nishie junratei no haikō ni kansuru ken,” Zai Honkon sōryōji Murakamiyoshiatsu yori gaimudaijin Tanakagiichi ate, 1929.02.16, *Nihon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Shina kaizoku kankei zakken, dai 2 kan*, F-0139/0253-0254.

〈支那陸海軍當局ノ「バイアス」灣海賊警備狀況ニ關スル件〉，在香港總領事村上義溫ヨリ外務大臣田中義一宛，1929年3月29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2卷，F-0139/0254-0255。

“Shina rikukaigun tōkyoku no ‘baiaru’ wan kaizoku keibi jyōkyō ni kansuru ken,” Zai Honkon sōryōji Murakamiyoshiatsu yori gaimudaijin Tanakagiichi ate, 1929.03.29, *Nihon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Shina kaizoku kankei zakken, dai*

2 kan, F-0139/0254-0255.

(八) 英文報紙

- “Bias Bay: Ceylon Papers Comment on Raid,” *The China Mail*, 21 September 1927.
“Canton’s Good Work,” *The North China Herald*, 26 January 1929.
“General Li Chi-Sen Non-Committal: Enthusiastic Over Canton; Be Constructed Enforced,”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6 March 1929.
“The *Seang Bee* Piracy,”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2 February 1927.

(九) 中文報紙

- 〈大鵬灣匪情調查員返省〉，《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6月6日，4版。
“Dapengwan fei qing diao cha yuan fan sheng,”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6.06, 4 ban.
〈公布各區善後章程條例〉，《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3月14日，5版。
“Gong bu ge qu shan hou zhang cheng tiao li,”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3.14, 5 ban.
〈公安局嚴緝劫擄新華輪船匪黨〉，《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4月23日，6版。
“Gong an ju yan ji jie lu xin hua lun chuan fei dang,”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4.23, 6 ban.
〈加派軍隊護航〉，《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1月13日，6版。
“Jia pai jun1 dui hu hang,”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1.13, 6 ban.
〈四善後區域將有軍艦梭游防盜〉，《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5月1日，3版。
“Si shan hou qu yu jiang you jun1 jian suo you fang dao,”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5.01, 3 ban.
〈各屬消息：惠陽〉，《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5月15日，9版。
“Ge shu xiao xi: Huiyang,”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5.15, 9 ban.
〈江大艦太平新墟剿匪〉，《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3月14日，5版。
“Jiang da jian Taiping xin xu jiao fei,”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3.14, 5 ban.
〈西路軍部隊剿滅西江股匪〉，《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1月6日，5版。
“Xi lu jun bu dui jiao mie Xijiang gu fei,”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1.06, 5 ban.

- 〈克萊孟德已由粵回港、日前曾與李濟深開會議〉，《世界日報》，1928年3月13日，2版。
“Ke lai meng de yi you yue hui gang, ri qian ceng yu Li Jishen kai hui yi,” *Shi jie ri bao*, 1928.03.13, 2 ban.
- 〈李濟深與港督會議：討論港粵間問題、英使已離港北上〉，《世界日報》，1928年3月4日，2版。
“Li Jishen yu gang du hui yi: tao lun gang yue jian wen ti, ying shi yi li gang bei shang,” *Shi jie ri bao*, 1928.03.04, 2 ban.
- 〈保護各江航行之通令〉、〈第五軍奉調駐防北江〉、〈十五師部隊出防西江〉，《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1月5日，4版。
“Bao hu ge jiang hang hang zhi tong ling,” “Di wu jun feng diao zhu fang Beijiāng,” “Shi wu shi bu dui chu fang Xijiang,”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1.05, 4 ban.
- 〈派員巡視各江兵艦〉，《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2月22日，4版。
“Pai yuan xun shi ge jiang bing jian,”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2.22, 4 ban.
- 〈徐景唐請剿東莞盜匪〉，《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2月23日，4版。
“Xu Jingtang qing jiao Dongwan dao fei,”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2.23, 4 ban.
- 〈徐景唐積極剿辦東江盜匪〉，《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2月25日，3版。
“Xu Jingtang ji ji jiao ban Dongjiang dao fei,”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2.25, 3 ban.
- 〈海軍出巡艦隊剿辦盜匪〉，《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2月25日，4版。
“Hai jun chu xun jian dui jiao ban dao fei,”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2.25, 4 ban.
- 〈海軍司令部密查匪蹤〉，《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1月28日，4版。
“Hai jun si ling bu mi cha fei zong,”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1.28, 4 ban.
- 〈海軍司令部清剿大鵬灣盜匪之計畫〉，《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6月13日，3版。
“Hai jun si ling bu qing jiao Dapengwan dao fei zhi ji hua,”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6.13, 3 ban.
- 〈海軍新艦將舉行進水式〉，《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4月13日，4版。
“Hai jun xin jian jiang ju hang jin shui shi,”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4.13, 4 ban.
- 〈海軍艦隊巡防東海：分段派艦嚴密巡防〉，《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6月6日，4版。

- “Hai jun jian dui xun fang Dong hai: fen duan pai jian yan mi xun fang,”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6.06, 4 ban.
〈海軍艦隊調回原防護航〉，《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1月27日，4版。
- “Hai jun jian dui diao hui yuan fang hu hang,”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1.27, 4 ban.
〈海瑞艦開赴汕尾協剿共匪〉，《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3月5日，5版。
- “Hai rui jian kai fu Shanwei xie jiao gong fei,”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3.05, 5 ban.
〈航政局調查各江盜匪情況：並徵求航商對於剿匪計畫〉，《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11月26日，5版。
- “Hang zheng ju diao cha ge jiang dao fei qing kuang: bing zheng qiu hang shang dui yu jiao fei ji hua,”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11.26, 5 ban.
〈訓政開始的廣東〉，《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2月9日，2版。
- “Xun zheng kai shi de Guangdong,”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2.09, 2 ban.
〈陳策剿辦海盜之進行〉，《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1月11日，3版。
- “Chen Ce jiao ban hai dao zhi jin hang,”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1.11, 3 ban.
〈剿匪消息續誌〉，《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4月20日，4版。
- “Jiao fei xiao xi xu zhi,”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4.20, 4 ban.
〈擬組東西江艦隊〉，《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4月13日，4版。
- “Ni zu Dong Xijiang jian dui,”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8.04.13, 4 ban.

(十) 專書

- 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編審會，《中國戰史大辭典——人物之部》，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2。
- Zhong guo zhan shi da ci dian ren wu zhi bu bian shen hui, *Zhong guo zhan shi da ci dian: ren wu zhi bu*, Taipei: Guo fang bu shi zheng bian yi ju, 1992.
- 吳翎君，《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為中心的探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 Wu, Lingjun. *Mei guo yu zhong guo zheng zhi (1917-1928): yi nan bei fen lie zheng ju wei zhong xin de tan tao*, Taipei: Dong da tu shu gong si, 1996.
- 李恩涵，《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 Li, Enhan. *Bei fa qian hou de 'ge ming wai jiao' (1925-1931)*,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93.

村上衛，《海の近代中國——福建人の活動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3。

Murakami, Mamoru. *Kai no kindai Chūgoku Fukkenjin no katsudō to Igrisu Shinchō*, Nagoya: Nagoradaigaku shubbankai, 2013.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Xu, Youchun, zhu bian. *Min guo ren wu da ci dian*, Shijiazhuang: Hebei ren min chu ban she, 199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Guo, Tingyi. *Jin dai zhong guo shi gang*, Hong Kong: Hong Kong zhong wen da xue chu ban she, 1989.

陳存恭，《列強對中國的軍火禁運(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Chen, Cungong. *Lie qiang dui zhong guo de jun huo jin yun (min guo ba nian zhi shi ba nian)*,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83.

黃月波等編，《中外條約彙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Huang, Yuebo, deng bian. *zhong wai tiao yue hui bian*, Shanghai: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35.

應俊豪，《英國與廣東海盜的較量——一九二〇年代英國政府的海盜剿防對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5。

Ying, Chunhao. *ying guo yu guang dong hai dao de jiao liang: yi jiu er ling nian dai ying guo zheng fu de hai dao jiao fang dui ce*, Taipei: Taiwan xue sheng shu ju, 2015.

Fung, Edmund S. K.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 1924-1931*.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Hamilton, Sheliah. *Watching Over Hong Kong: Private Policing 1841-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Woodhead, H. G. W. ed, *The China Year Book*. Shanghai: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 1912-1939.

(十一) 論文

牛大勇，〈對1927年南京事件的再探討〉，《江海學刊》，第6期(南京，1989.6)，頁145-150。

Niu, Dayong, "Dui 1927 nian Nanjing shi jian de zai tan tao," *jiang hai xue kan*, di

6 qi (Nanjing, 1989.06), ye 145-150.

呂芳上，〈北伐時期英國增兵上海與對華外交的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7期(臺北，1997.06)，頁187-229。

Lu, Fangshang, "Bei fa shi qi ying guo zeng bing Shanghai yu dui hua wai jiao de yan bian,"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ji kan*, di 27qi (Taipei, 1997.06), ye 187-229.

韋慕庭，〈國民革命：從廣州到南京(1923-1928)〉，收入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Wei, Muting. "Guo min ge ming: cong Guangzhou dao Nanjing (1923-1928)," shou ru Fei Zhengqing, zhu bian. *Jian qiao zhong hua min guo shi*, Beijing: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1993.

徐敏蕙，〈李濟深人際網絡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3。

Xu, Minhui. "Li Jishen ren ji wang luo yan jiu," Jiayi: Guo li zhong zheng da xue li shi xi bo shi lun wen, 2013.

張俊義，〈英國政府與1924年廣州商團叛亂〉，《廣東社會科學》，第3期(廣州，2000.06)，頁100-108。

Zhang, Junyi. "Ying guo zheng fu yu 1924 nian Guangzhou shang tuan pan luan," *Guangdong she hui ke xue*, di 3 qi (Guangzhou, 2000.06), ye 100-108.

應俊豪，〈1924-1925年英國政府處理廣東海盜問題的策略運用：中英軍事合作剿盜行動〉，《國史館館刊》，第37期(臺北，2013.09)，頁1-48。

Ying, Chunhao. "1924-1925 nian ying guo zheng fu chu li Guangdong hai dao wen ti de ce lue yun yong: zhong ying jun shi he zuo jiao dao hang dong," *Guo shi guan guan kan*, di 37 qi (Taipei, 2013.09), ye 1-48.

應俊豪，〈1927年英國海軍武力進剿廣東海盜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1期(臺北，2014.05)，頁149-210。

Ying, Chunhao. "1927 nian ying guo hai jun wu li jin jiao Guangdong hai dao yan jiu," *Guo li zheng zhi da xue li shi xue bao*, di 41 qi (Taipei, 2014.05), ye 149-210.

應俊豪，〈五卅事件後中英合作防制廣東海盜問題交涉〉，「國際合作在中國外交史學術研討會」，臺北：政大人文中心，2016年1月29日。

Ying, Chunhao. "Wu sa shi jian hou zhong ying he zuo fang zhi guang dong hai dao wen ti jiao she," 'guo ji he zuo zai zhong guo wai jiao shi xue shu yan tao hui,' Taipei: Zheng da ren wen zhong xin, 2016.01.29.

應俊豪，〈英國與中國南北兩政府—北伐初期天津英租界國民黨人引渡案研究(1926)〉，《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12期(臺北，2007.09)，頁61-84。

Ying, Chunhao. "Ying guo yu zhong guo nan bei liang zheng fu: bei fa chu qi

Tianjin ying zu jie guo min dang ren yin du an yan jiu (1926),” *Zhong hua jun shi xue hui hui kan*, di 12 qi (Taipei, 2007.09), ye 61-84.

應俊豪，〈愛仁輪事件與國民政府外交部的處置對策〉，收入王文隆等著，《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臺北：政大出版社，2016。

Ying, Chunhao. “Ai ren lun shi jian yu guo min zheng fu wai jiao bu de chu zhi dui ce,” shou ru Wang Wenlong, deng zhu, *Zhong guo wai jiao de da li shi yu xiao li shi*, Taipei: Zheng da chu ban she, 2016.

“Hongkong - The Changing Scene - The Piracy Problem - Trade - A Government Loan (From Our Correspondent),” 5 November 1927, *The Economist*, 105:4399 (17 December 1927), 22-23.

Tang, Chi-hua. “*Britain and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26-1928*,” London: Ph. D. disserta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91.

(十二) 其他網路資料

國史館，〈民國重要史事檢索系統〉，1928/3/19、3/30、4/7、4/17等日記載。
<http://210.241.75.208/newsnote/>，2016/1/15檢閱。

guo shi guan, “min guo zhong yao shi shi jian suo xi tong,” 1928/3/19, 3/30, 4/7, 4/17 deng ri ji zai, <http://210.241.75.208/newsnote/>, 2016/1/15 jian yue.

Parkes O. and Maurice Prendergast ed., *Jane's Fighting Ships*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1919), 93-94.

(http://freepages.genealogy.rootsweb.ancestry.com/~pbtvc/Janes_1919/Index.html)
Online Data。

Détente and Negotiations over Piracy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1928-1929

Ying, Chun-hao

Professor, Institute of Oceanic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i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in suppressing piracy from 1928 to 1929, as the two countries had gradually improved their relationship since the later part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Particularly,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anton authority under Li Chi-sum and Britain.

Hong Kong was closely connected to Canton in terms of both location and commerce, and such connection explained wh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lways wanted to support a friendly Canton authority. With the launch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he headquarters of Kuomintang was moved to the Yangtze valley, and Li Chi-sum was ordered to stay in Canton to manage the home front. The British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 were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and in return Li Chi-Sum gave a positive response. Thus, the British gradually developed closer interaction with Li Chi-sum, while the overall Sino-British relationship was far from improving. Li Chi-sum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deal with piracy, a problem t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d hoped to resolve for a long time.

In addition, piracy not only bothered the British, it caused tremendous loss to the local business and residents of Canton. Rampant pirating threatened the safety of civilians, jeopardized regular commerce, and affected tax income. It was necessary for Li Chi-sum to face the severity of piracy, otherwise it might undermine his status and power in Canton and China.

Furthermore, the Sino-British relationship also underwent significant changes

as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progressed. As the Japanese Army intervened in Shantung,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djusted its foreign policy toward Britain: moving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 China needed to win the Britain's diplomatic support in dealing with Japan. Therefore,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Canton authority showed more determination in dealing with piracy in South China waters between 1928 and 1929. Under such friendly circumstances, the British lifted its arm embargo by selling warships and munitions to Canton, and made a positive appraisal of China's efforts.

**Keywords: Kwantung Piracy, Sino-British Relationship, Northern Expedition,
Li Chi-sum**

